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
2016 年 12 月，頁 47-104

BIBLID1012-8514(2016)58p.47-104
2015.12.22 收稿，2016.3.1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6.58.02

由「詩卷」到「總集」
——元代士人交遊的文化表現

陳 雯 怡*

提 要

本文討論元代新出的一種總集類型：收錄個人一生所得贈答酬唱詩文，姑稱為「酬贈總集」。這類總集收錄眾人之作，但選擇標準不在作者（挑選某一作者之某些作品），而在一個共同的特定受贈者。相對於單人詩文的別集，或眾人之作的精選，或數位作者彼此唱和的作品，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理念。本文首先將此一新類型放在唐宋以來總集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次則從當代的文化行為——「詩卷」——探討酬贈總集的出現，最後則以現存的《金蘭集》和《澹游集》為例，觀察詩卷與總集這兩種文化形式的表現。這類總集不算普遍，流傳下來的更少，然其出現實為元人社交活動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士人在交遊中形成其身分和社會形象的極致表現，亦可說是當時士人交遊文化的表徵，不當視之為一般唱和集而忽略其產生的文化背景。

關鍵詞：總集　詩卷　金蘭集　澹游集　元代士人　交游文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E-mail: wenyi@asihp.ne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由詩文活動而產生的「總集」
二、元代的「詩卷」文化
三、由詩卷到總集——以《金蘭集》與《澹游集》為例
結　語

前　言

明末清初著名的藏書家朱彝尊（1629-1709），在其所作的〈小方壺存稾序〉中提到元人的一些唱和總集：

> 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1]

朱彝尊特別稱許元人酬唱之風，相對於視元世為「黑暗」時期的看法，透露了對元代文化評價的轉變。[2]朱氏注意元代中後期一些總集集體的意

1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79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重印），卷 39，〈小方壺存稾序〉，頁 4 下。

2 這必須放在清人對元代文化重新詮釋的脈絡中理解：不同於明初批評元代「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對元後期文人文化的嚮往，似為清代逐漸興起的一種態度。例如，東海一老柯（徐柯）之〈金蘭集序〉（約作於康熙後期）提到「元世政寬民富，習俗好文」，以顧瑛、倪瓚、徐達左等之「儒雅文藻，樂施予、喜賓客」，對照「今之人厚自封殖，目不知書，仇視文士」。見〔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176，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條，頁 2666；〔元〕徐達左輯錄，楊鐮、張頤青整理，《金蘭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3。又〔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 30，〈元季風雅相尚〉，頁 445。關於清人對元代文化的詮釋與其自身處境的關係，參 John D. Langlois,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no. 2 (December 1980), pp. 355-398. 明初為建立政權合法性而批評前朝，見張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即與元人酬唱文化的關聯）；然其所舉諸例實包含不同主題與形式：如《圭塘欸乃集》乃兄弟父子一家酬唱之作，《麟溪集》係眾人歌詠一義門家族，《玉山名勝集》是園林題詠和宴集酬唱的結合，《草堂雅集》則非唱和集，而是顧瑛（1301-1369）以其交游為主所編的詩選。至於《金蘭集》和《敦交集》是收錄個人一生所得贈答酬唱詩文的總集，乃元代之新發展，相對於此前的「唱和集」，我暫以「酬贈總集」稱之。本文即試圖探討酬贈總集出現的時代脈絡和歷史意義。

魏仲遠（魏壽延）《敦交集》和徐達左（1333-1395）《金蘭集》都編於元明之際，同一時期另有釋來復(1319-1391）的《澹游集》，和釋克新（1322-?）的《金玉編》，今皆尚存。稍早見於紀錄者，則有元中期知名文學道士張雨（1283-1350）的《師友集》，[3]為其「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4]《師友集》今雖不存，不過明初佚名所編的《詩淵》收錄一百多首《師友集》中的作品，[5]可以略窺黃溍序言「所積之富」之一斑。又高巽志的《師友集》編於明初，[6]今不存。另如元中晚期郭郁的《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收錄郭郁仕宦各地時與當地士人唱酬（不含郭郁個人之作）或士人頌揚郭郁的詩文，其主題雖以宦績為主，但就形式亦可納入此一類型。[7]上述諸例顯示，元後期到明初，個人收錄交游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3 參孫克寬，〈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張雨〉，收入氏著，《寒原道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頁 285-311。

4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4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印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影印），卷 18，〈師友集序〉，頁 15 上。

5 〔明〕佚名，《詩淵》（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稿本影印）。

6 〔元〕徐一夔撰，徐永恩校注，《始豐稿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卷 11，〈師友集序〉，頁 303。

7 我在〈從去思碑到言行錄——元代士人的政績頌揚、交游文化與身分形塑〉中討論了其所反映的元代士人交游活動與頌揚文化。該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6 本第 1 分（2015 年 3 月，臺北），頁 1-5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贈遺之詩文的總集密集出現，並不是單一特例。[8]

這類總集收錄眾人之作，選擇標準在共同的受贈者（作品被收錄因與某一特定受贈者相關），而非作者個人。相對於單人詩文的別集，或眾人之作的精選，或數位作者彼此唱和的作品，編輯理念完全不同。關於這些總集，楊鐮曾在他討論元詩文獻的著作中介紹了幾部。[9]另有些研究針對其中一部探討，[10]也陸續有文章運用這些總集保存的詩文資訊。[11]本文關注的則是這種新形式的總集與之前的類型有何異同？為什麼「酬贈總集」在元後期集中出現？反映出當時什麼樣的士人文化？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從幾個方向探索。首先，必須將「酬贈」放在「贈答」、「唱和」的詩文活動脈絡中。從嚴格的文學形式而言，「贈答」與「唱和」是不同概念，但在實際的士人活動中則未必區別。至少

8 元初有雪堂上人釋普仁所集文字，見〔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24-22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翻元本景印），卷 43，〈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頁 5 上。此集未著錄，亦不見他人提及。普仁曾有著名的《雪堂雅集》。

9 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624-625、727-729，和《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頁 550、557、564、580。

10 關於《金蘭集》，有祝軍，〈《金蘭集》考論〉，《河南社會科學》2011 年第 6 期（鄭州），頁 156-158；王媛，〈元明之際耕漁軒文藝活動考論〉，《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2 期（包頭），頁 44-48。關於《澹游集》，〔日〕井手誠之輔，〈研究資料：見心來復編『澹游集』編目一覽（附、見心來復略年譜）〉，《美術研究》第 373 期（2000 年 3 月，東京），頁 209-227；劉嘉偉，〈釋來復澹游集文獻價值芻議〉，《新世紀圖書館》2014 年第 7 期（南京），頁 73-75；劉嘉偉，〈詩僧來復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動考論〉，《五臺山研究》2014 年第 3 期（太原），頁 28-31。《敦交集》與《金玉編》目前尚未見到個別研究。

11 例如楊鐮由包括這幾部在內的總集，尋回一些因元明易代而泯滅的元末期大都文人；徐永明在《澹游集》中找到《琵琶記》作者高明的幾篇佚詩佚文，藉以重新確定其事蹟之繫年；徐維里利用《澹游集》的資料重建來復生平。見楊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後的大都文壇〉，《文學遺產》2004 年第 6 期（北京），頁 96-103；徐永明，〈高則誠生平行實新證〉，《文學遺產》2006 年第 2 期（北京），頁 93-98；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以見心來復為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自唐代以來，贈答與唱和已常混同。[12]下至元代，「唱酬」一詞意涵廣泛，兼唱（和）與（贈）酬，亦可指集體賦詠，無論是同時或異時，同題或分題或分韻，唱酬、酬唱、唱和等詞泛泛使用時，可說即詩文往來的代稱。我們既須瞭解元人一般不特別區分這些語彙，因皆為其日常詩文往來習用，亦須注意長期趨勢中形式之異，因為它們反映了活動內容與群體特性的差別。

其次，必須思考「總集」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意義。「總集」是目錄學的概念，相對於個人的「別集」而言，收錄至少二人以上的作品。唐初所編的《隋書．經籍志》以西晉摯虞（?-311）《文章流別集》為總集的開端：

>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13]

這是在著作日多的情勢下，收錄、整理精華之作。唐宋以降，總集日增，其類型也日新。最初多為一代之綜合或精華，以時期及對作品本身的評價為選擇標準。後來開始有一地或一家之總集，以空間或人群性質劃分，作者的身分為首要原則。隨著士人間文學活動如酬唱的盛行，也有些總集是這類活動的成果。不過，直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序》所言：

>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14]

可以看出，關於總集的概念，仍以「大全集」或「精華集」為主。一般

12 參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第二章。

13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點校本），卷 35，〈經籍志四〉，頁 1089。

14 〔清〕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186，〈總集類一〉，頁 4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多從文學史的角度，探討總集收錄標準所反映的文學觀念，或其流傳對詩文寫作所發揮的影響。[15]然而，總集不純粹是文學品評的結果，也有其存在的現實脈絡，宋代以降科舉用書類的總集大量出現，即是一例。如果從「關係」的角度思考總集收錄作品的作者如何被聯繫在一起，則透露許多關於士人社會文化活動的訊息。[16]更重要的是，「總集」本身是一種士人行為的結果，需要有人先動念編纂，並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環境才得以實踐。因此，從某種類型之總集所見，不僅是其內容，同時是編纂總集的意向，是總集形式對編者（以及當代一些人）的社會文化意義。

第三，長時段可讓我們觀察酬贈總集之「新」意，但新類型之產生卻不當被視作自然的流變，其出現必須從當代的士人文化——即元代的詩卷文化——來理解。「詩卷」原本僅是錄詩之卷軸，本文將討論的「元代詩卷文化」則特指宋代以來逐漸增多、至元大盛的「主題詩卷」，係集合眾人頌詠某一特定主題的詩卷。

本文首先將此一新類型放在六朝以來總集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次從當代的文化行為——「詩卷」——探討酬贈總集的出現，最後則以現存的《金蘭集》和《澹游集》為例，觀察詩卷特性與總集這兩種文化形式的關聯及意義。

---

15 對《文選》的討論是最明顯的例子。另如 Pauline Yu 從經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角度討論總集（anthology），見 Pauline Yu,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 1 (June 1990), pp. 163-196.

16 從反面來陳述此一現象者，見李珍華、傅璇琮，〈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中國韻文學刊》1988 年第 2、3 期（湘潭），頁 10。透過總集研究士人活動及社交網絡者，如賈晉華之《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二版），提出「集會總集」的概念，以研究唐代的詩人群體。Tobie Meyer-Fong 分析總集中展現的友誼網絡，由此討論清初「貳臣」與不仕「遺民」間的關係，指出「歸順」清廷的過程並非僅由朝廷推動。Tobie Meyer-Fong, “Packaging the Men of Our Times: Literary Anthologies,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the Early Q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 no. 1 (June 2004), pp. 5-56. 這些研究直接從個別總集討論具體的人際網絡，本文則將先探討這類總集的「形式」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由詩文活動而產生的「總集」

「酬贈總集」收錄交游所贈詩文，具有兩個要素，一是贈答、唱和等詩文活動，二是往來的人際關係。因此，不同於一般從文學或目錄學角度研究總集時的關懷，本文重心將放在總集編纂中與活動、人群相關之概念的表現，特別以「唱和集」和「主題總集」為對照，觀察酬贈總集出現的脈絡。

（一）六朝

唐以前的總集基本上記錄於《隋書·經籍志》，據清人姚振宗統計，編者所見共 147 部，附錄南朝梁尚存之亡書 189 部，但今存者僅 2 部。[17]在《隋書·經籍志》標舉為總集之始的《文章流別集》前，已有不少收錄單一文體眾人之作的總集，如應璩（190-252）《書林》、荀勖（?-289）《晉歌詩》等。事實上，在這段時期，專收一體的總集遠多於《文章流別集》之類兼收眾體的總集，如賦、詩、頌、碑、論、誡、贊、奏、詔、表、啟事、書、策等等，種類繁多。此當與其時眾文體之興起有關，無論是單收一體或匯聚眾體的總集，抑或收錄個人諸體之作的別集，都可說是當時整理勃興之文學創作，彙而成集，以便觀覽參考的表現。[18]

在上述整理文學的主流之外，亦可見到一些因活動而成集者。如《齊釋奠會詩》20 卷、《齊宴會詩》17 卷、《青溪詩》30 卷（卷數下註：「齊讌會作」），以及其時已佚的「魏晉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

17 魏徵等《隋書·經籍志》：「右一百七部……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隋唐五代五史補編》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863。另可參王重民，〈隋書·經籍志〉，收入氏著，《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88-96。

18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二章；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121-13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百四十三卷」。如此，在總集開始編纂、總集概念正在發展之時，已出現不少宴會詩集。從名稱看來，這些宴會詩集皆為皇室或公卿等公家公宴而作。由於這些總集今皆不傳，無法得知它們是在什麼情況下、以何種形式編輯，編輯的意旨為何，或流通的程度。不過，兼收眾體之大型總集《文選》的分類，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在《文選》詩類之下，分 24 小類，有公宴、祖餞等目，且為其中較盛之類別。[19]可見由宴游、祖餞等群體活動而產生之詩在當時頗盛，已被識別而成為特定分類，這是總集中宴會詩集的整體背景。對《文選》公宴詩的研究指出，公宴詩與禮、儀式的密切關聯，其編纂成集或可放在此脈絡中理解。[20]就形成的過程而言，《齊釋奠會詩》等多達二、三十卷，或為數次宴會詩之集合，而如晉《元正宴會詩集》4 卷、宋《元嘉西池宴會詩集》3 卷之類，則可能是個別公宴的直接產物，是單次活動紀錄。另有徐伯陽《文會詩》，[21]看來是私人宴游，《隋書．經籍志》並未與宴會（公宴）詩集置於一處，似有所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金谷詩序〉和〈蘭亭集序〉都是宴會詩序，但無論唐初編纂的《隋書．經籍志》或基於開元時期藏書目錄的《舊唐書．經籍志》，都未著錄《金谷詩》或《蘭亭詩》（宋仁宗朝編的《崇文總目》則有「王右軍蘭亭詩集一卷」），顯示即使有（眾）詩有序，也不能簡單等同於一部總集。無論動機為何，宴會詩集有其自身的脈絡，與摯虞為「苦覽者之勞倦」而彙集刪裁的「總集」概念不同。《隋書》

19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 249。公宴詩，參胡大雷，〈中古「公宴」詩初探〉，《廣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南寧），頁 65-72；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祖餞詩，參胡大雷，〈中古祖餞詩初探〉，《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6 期（1998 年 12 月，南寧），頁 95-99。

20 相對地，贈答雖是《文選》大類，卻沒有單獨的贈答詩集，除了作為詩的一類，以其文學形式被收集外，並無其他因素（如展現個人交誼）使之單獨結集。

21 〔唐〕姚思廉，《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34，〈文學傳．徐伯陽〉，頁 468-469。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標舉摯虞的典範，重視其「以為覃奧，而取則焉」的價值，[22]但又收入宴會詩集之類，顯然僅取其眾人之作的形式。另一方面，儘管宴會詩集被收入總集類中，卻未影響關於總集的主流概念。

（二）唐

唐代總集目前可考者 200 餘種，大致可區別為文總集和詩總集。詩總集，陳尚君考得 137 種，另存目 50 餘種，其中有 11 種詩文合集；文總集，盧燕新考得 82 種，16 種為詩文合集，部分與陳尚君所考重疊。[23]由於本文關懷的是總集編纂反映的文化與心態，這些考訂，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據書目者，其中有不少五代時所編，或編者不詳且僅見於宋以後書目者，亦即，可以確定為唐時所編的總集數量更少。[24]二、書目之外，有些僅據序而考知，非皆曾著錄，有些或如上述六朝《金谷詩》、《蘭亭詩》之例，未必被視為總集。就現可考者看來，文總集不見與活動相關者；詩總集則是唐代較可看出士人活動與文學發展的類型。

延續晉《文章流別集》、南朝梁《文選》，編選歷代或各代詩文名作是唐代總集主要類型。以陳尚君所考詩總集為例，137 種中佔了 72 種，[25]超過半數。若再合計文總集，共佔了四分之三左右。這種以詩文的體裁、風格、品質作為選錄標準，是上述《隋書・經籍志》以來對總集的主要概念。另有一種是由文學活動而生，以現存者為例，會宴之詩

22 魏徵等，《隋書》，卷 35，〈經籍志四〉，頁 1090。

23 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收入氏著，《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184-222。盧燕新，〈唐人編選文總集輯考〉，收入氏著，《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 348-374。

24 唐代書目，《舊唐書・經籍志》據唐毋煚的《古今書錄》修成，收錄至開元時期，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補足開元後唐人著作，但與宋廷藏書的《崇文總目》同為宋仁宗時所編，兩者所錄唐總集未必皆成於唐代。關於這幾種書目，參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94-106。

25 通代詩選 6 種，斷代詩選（「唐人選唐詩」）47 種，詩文合選 11 種，詩句選集 8 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為一集，有高正臣編《高氏三宴詩集》；唱酬成集，如皮日休（867進士）與陸龜蒙（?-881）的倡和詩《松陵集》；或餞別詩集，如賀知章（659-744）退休時的《賀秘監歸鄉詩集》[26]等。

六朝的宴會詩集，主要是皇室貴族公宴之詩。唐代各類宴會賦詩頗眾，從宴會詩序可見其盛，[27]然不見錄於書目，編輯為總集而流傳於後者僅《高氏三宴詩集》及附於其後的白居易《香山九老詩》。《高氏三宴詩集》篇幅不大，亦未必為唐時所編，[28]且其性質為私宴。因此，公宴總集的傳統在唐代並未延續，而私宴成集者亦不多見。

《文選》有祖餞詩，但六朝無祖餞總集。唐代以詩餞別亦盛，至於送別詩結集，陳尚君考得 12 種，無《舊唐書．經籍志》著錄者，亦即截至開元時期並無祖餞總集。《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僅《朝英集》，[29]其他皆為宋以後書目著錄或見於其他記載，未能確定為唐人所編。如此，以餞別詩為總集在唐代已出現，但並不盛。

與活動相關的總集在唐代最突出的是唱和詩集。六朝時已有和詩，但在《文選》中尚未獨立成類，[30]唐代約在玄宗朝開始出現收集唱和詩

---

26 《會稽掇英總集》收有唐明皇〈送賀秘監歸會稽序 并詩〉，及其下〈同前〉和詩 36 首（〔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以下簡稱《四庫全書》，不另註出版資料〕，卷 2，頁 6 上至 14 上）。據陳尚君考證，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清鈔本《賀秘監歸鄉詩》同（〈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頁 216）。陳尚君據收錄晚唐姚鵠等人作詩，推測此集之編不早於唐末。不過也不能排除後來添加的可能。惟兩唐志未著錄此集，僅見於稍後的《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

27 吳振華，〈從宴會詩序看唐詩創作趨向的轉變〉，《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廣州），頁 1-12、19。

28 陳尚君指出唐宋書志皆未著錄《高氏三宴詩集》，懷疑《四庫全書》所據本自宋代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中錄出（〈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頁 203）。另《香山九老詩》僅 9 首詩，實為組詩。

29 見〔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卷 60，〈藝文志四〉，頁 1622，今佚。

30 和詩的分類演變，參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總集。[31]《新唐書．藝文志》著錄 20 種，[32]一般篇幅不大，其中 9 種僅 1 卷，當是個別唱和活動的作品。從唐代的文獻看來，唐代前期宮廷應制唱和很盛，但少以總集形式流傳。[33]安史之亂後，則有兩類興起，[34]一是以藩鎮幕府為中心的唱和，通常在一地，時間長，參與人數眾。如大曆（766-779）初年的《大曆年浙東聯唱》，編者不詳，《新唐書．藝文志》著錄。[35]唐次在貞元八年到十九年（792-803）任開州（盛山）刺史時的《盛山唱和集》則有權德輿（754-818）序，為與地方僚屬和士人唱和之作，[36]此集之編，頌揚唐次風範，兼具紀念友人之意。兩藩鎮間唱和者，如《新唐書》著錄裴均相關唱和集 5 種，[37]唯一資訊較詳者是韓愈（768-824）作序的《荊潭唱和集》，為裴均貞元十九年（803）任荊南節度使（荊），楊憑貞元十八年（802）任湖南觀察使（潭）期間，兩人暨兩府從事、屬吏唱和之作。[38]另一類是二、三知交間的唱和，乃

31 見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 1。

32 陳尚君考得 46 種「唱和集」，但有不少未曾著錄，或編者不詳，未能確定為唐人所編或實編於見於著錄的宋代。見〈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頁 203-215。

33 參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第四章；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下編第一章。一般被視為宮廷唱和集者，《翰林學士集》為許敬宗集殘卷（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頁 215-216；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頁 210）；《景龍文館記》是包含詩文在內的紀錄，《珠英學士集》是選集，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頁 41-72、207。

34 盧燕新指出唱和集大盛於中唐，與其時許多文士離京到地方任官的時局及文化變動有關，但未解釋為何此前宮廷唱和未編輯，而此時地方唱和則編輯成總集。見盧燕新，〈唐代詩文總集編纂者及其心態〉，收入氏著，《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頁 92-119。

35 參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頁 73-85。

36 權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見〔宋〕李昉等編，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據宋刊本及明隆慶元年〔序〕胡維新刊本影印），卷 712，頁 3679。

37 裴均 5 種唱和集，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頁 205-206。藩鎮幕府唱和，參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上編第四章。

38 見〔唐〕韓愈，〈荊潭唱和集序〉，收入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4，頁 262-263。另如《荊夔唱和集》，據陳尚君考證是裴均與唐次（另有上引《盛山唱和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和（806-820）後之重要發展，最突出的是白居易（772-846）、元稹、劉禹錫（772-842）、令狐楚（766-837）等人的唱和集（共 9 種）。他們不僅唱和頻繁，且將作品以總集的形式集結流傳。唐代個人文集常附錄與作者唱和的他人之作，[39]另行結集，則顯示對此類作品的重視，以及這種唱和對他們的意義。如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的唱和，成為友朋間的文學競技（「詩敵」），因珍惜此過程中激發的佳章，將之編輯成集。[40]白居易撰文指出，《劉白〔唱和〕集》編錄後，交兩人子姪「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但接著提到他當年和元稹「唱和頗多，或在人口」，與劉禹錫的唱和詩亦「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41]顯然亦預期其廣傳，這便讓「集」的意義超過私人的保存、紀念。白居易曾將《劉白〔唱和〕集》寄給令狐楚，透露當時唱和集流傳的方式之一，令狐楚因而欲仿效編輯其與劉禹錫之唱和集，[42]則也顯示轉相仿效對當時編輯唱和集成風的影響。不過，唱和集雖眾，卻集中於一小群人，顯示此風尚在初興階段。

另有《僧靈澈酬倡詩》，乃個人長期唱和作品結集，由弟子在靈澈沒後多年所編，[43]但未明言是否包含他人作品。無論如何，將靈澈一生酬唱之作，與其他詩作分開，視唱和詩自成一類的態度，與此時唱和成集互相呼應。

由上可見，第一，因活動而生之總集，其旨趣與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提要．總集類序》所提出的總集性質實大異。陳尚君〈唐人編

39 如張說的文集包括以張說為主角之餞行、酬唱活動的整體紀錄，但若為張說參加其他酬唱活動，則僅錄其個人之詩。見〔唐〕張說撰，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40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點校本），卷 68，〈與劉蘇州書〉，頁 1445。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亦言：「今業六義以著稱者，必當唱酬往復，亦所以極其思慮，較其勝敗。」該文見《文苑英華》，卷 716，頁 3072。

41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 69，〈劉白唱和集解〉，頁 1452-1453。

42 〔唐〕劉禹錫，《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點校本），卷 39，〈彭陽唱和集引〉，頁 588。又參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頁 353。

43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 19，〈澈上人文集紀〉，頁 24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選詩歌總集敘論〉提出「選集」與「合集」的概念，將其文中所分唱和集、送別集、家集三類視為「合集」，與「選集」（分通代詩選、斷代詩選、詩文合選、詩句選集四類）之差別，顯然便是這些合集因活動（或人際關係）[44]的標準收錄，「合」而為一，不同於以詩文表現而「選」錄的「正宗」總集。

第二，唐代因活動而生的總集中，最顯著的是唱和集之多，可見唐代唱和之盛，但更重要的是此時出現將唱和收錄成集的態度，這種唱和集表現的內涵不同於早期大型的應制唱和，重在文學表現，尤其是士人的文學情誼。事實上，除了二、三友朋間的往來酬唱或異地寄和外，宴會、送別詩集泛泛而言，亦為不同場合、情境（宴游、餞別）中的詩文唱酬。[45]宴會常是文人活動的要素，餞別可以有宴亦可無宴，唱和主要是作詩的形式。在這三種的交錯中，如果餞別、宴會代表大群體的活動，唐代（活動）總集凸顯的是知交「唱和」的概念，而非宴、餞等集體的詩文活動。

（三）宋

宋代總集更盛，據祝尚書估算，宋、明書目著錄的宋代總集有 300 多種，僅見於序跋者更多，現存者約 80 餘種，亦較六朝 2 種、唐約 20 種為多。[46]此一變化的整體背景是宋代書籍數量因印刷日盛而遠過於前代，但宋代還有許多書籍並不曾以雕印的形式出版，[47]因此必須區別其

44 另一種收錄原則是以「人」——作者間的關係或身分特質的作者——出發，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討論。

45 如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分析的「集會」總集，即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討論的「唱和」總集。

46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4-5。李凱統計歷代正史〈藝文志〉所收總集數目，指出宋編總集數目僅次於清代。見李凱，〈宋代的總集編纂〉，《內江師專學報》1991 年第 3 期（內江），頁 57-63。

47 〔日〕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3）；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用的範圍，不能泛泛以印刷盛行來解釋。[48]在這些總集中，「選集」仍是主流，亦有多樣發展，由於非本文重點，此不多贅，但應避免因下文長篇大論分析「合集」，而誤認其為宋代總集的主線。

本文所關心的各種「合集」中，首先，酬唱之集在宋代仍盛，但其於整體總集中的比重則不若唐代之高。以祝尚書的《宋人總集敘錄》及〈散佚宋人總集考〉為基礎統計：[49]《宋人總集敘錄》收了 85 種總集（有 9 種實編於元代），僅 5 種為唱和集；〈散佚宋人總集考〉182 種，其中唱和集有 24 種。唱和集總數並不多於唐代，在總集中的比例更大為降低；而唱和集在尚存總集中比例極低，見於記載者略高，也意味著唱和集少見流傳。

依參與者的身分及活動性質，可以將宋代的唱和集區分為幾種，以探討其編輯的原因和條件。一是皇帝與群臣的唱和。延續唐代風氣，北宋早期，特別是太宗、真宗時期，皇帝與群臣大規模的宴游，常伴隨著朝臣應制賦詩或皇帝與官僚間的唱和，[50]表現在總集上，如杜鎬編《君臣賡載集》、[51]李虛己《明良集》500 卷為「真宗御制及羣臣進和歌」[52]等。這類「總集」為宮廷活動紀錄，可能成編後即送史館收藏，而從未流傳。二是朝廷官員之間自發（非「應制」）的唱和。最著者自然是真宗年間楊億（974-1020）的《西崑酬唱集》，為其修《冊府元龜》期間與館閣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指出 16 世紀中葉印本才超越抄本。

48 如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在上編介紹刻書產業後，下編討論對文學的影響，「總集」一節便綜論宋代總集之盛，並不細分究竟是否版刻，直接將刻書發展與文學表現連結，建立因果關係。

49 祝尚書僅考曾著錄之書有其他資料可證者，不包括僅見於序跋而未著錄者。其書出版後，陸續有幾篇文章補遺，不過差別不大，且有些未注意是否著錄的問題。

50 參陳元鋒，《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51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點校本），卷 209，〈藝文志八〉著錄（頁 5394），今佚。

52 〔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藝文略第八〉，頁 17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僚唱酬的詩作，「西崑體」一名即由此而得。[53]稍後如歐陽修《禮部唱和詩集》，為仁宗嘉祐二年（1057）其任禮部試考官時與同僚五人唱和的結集，今不存，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54]又如鄧忠臣《同文館唱和詩》，為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同文館考校的試官們的唱和。[55]早在太宗朝，有李昉（925-996）、李至（947-1001）的《二李唱和集》，為端拱二年至淳化二年（998-991）間二人分任尚書右僕射及吏部侍郎兼祕書監，「身閑務簡」時的唱和之作，[56]尚承襲唐中葉三、兩知交間的唱和模式，自《西崑酬唱集》以來則為同僚共事時的唱和之作。每一部唱和集可說是一次短期活動的紀錄，相對於君臣宴游唱和，這些是當時朝廷官僚的詩文活動，反映北宋館閣文化。[57]歐陽修提到《西崑酬唱集》使「風雅一變」的影響力，[58]而他在編《禮部唱和詩集》時，除了回憶當時唱和情景，自認為「一時盛事」，[59]也費心刪修，確定「眾作極精，可以傳也」，[60]顯示除了紀念，亦有倡導文學風格變化之意，透露編輯這類唱和集的動力。

上述同僚共事的唱和集多是個別、單次、短時期內唱和的結果。相

53 關於西崑體、《西崑酬唱集》及以楊億為中心之文派的研究不勝枚舉，專著可參曾棗莊，《論西崑體》（高雄：麗文文化，1993）。

54 四庫館臣未見，《四庫提要》未收。參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附錄一〈散佚宋人總集考〉，頁 530-531。

55 呂肖奐有系列文章討論此總集。她指出此次同文館考校當為開封解試，而非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所認為的吏部選人，見呂肖奐，〈元祐更化初《同文館唱和詩》考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3 期（成都），頁 91-97。

56 《四庫提要》未收，今存，參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頁 1-5。

57 參陳元鋒，《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成明明，《北宋館閣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此後亦少見，祝尚書考有南宋熊克《館閣喜雪唱和詩》，見〈散佚宋人總集考〉，頁 576。

58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收入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951。

59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 5 冊，《歸田錄》，卷下，頁 1938。

60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 6 冊，卷 148，〈與梅龍圖摯字公儀一通〉（嘉祐二年），頁 244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地，收錄個人較長時間內多次酬唱作品而成集者少見，楊億的〈廣平公唱和集序〉提到，北宋早期宋白（933-1009）曾將其任翰林學士承旨時的唱酬作品彙集成七卷之《唱和集》，欲「傳於世」。[61]又北宋後期釋宗本的《丹霞賞音文集》，為其「得士大夫詩文亡慮三百篇」，其弟子欲鏤版廣傳，請鄧肅（1091-1132）作序。[62]此二書今佚，亦從未見於著錄，或與唐代《僧靈澈酬唱詩》近似。就總集類型與士大夫交游文化而言，既未流傳，亦未產生影響。

三是士大夫在地方的唱和。有些是地方官員與僚屬、地方士子的宴集唱酬，可說是朝廷宴集唱和的地方表現。如歐陽修在仁宗皇祐元年（1049）知潁州，有《聚星堂詩》，[63]顯示此一宴集分韻唱酬的時間相當早，[64]其詩編成一「集」，且流傳頗廣，受到歆羨，當亦有影響；但不見於著錄，亦不清楚是否曾刊刻。有些則是少數文友之間多次的唱和，不限身分，曾著錄者如張逸（?-1040）、楊諤的《潼川唱和集》，不晚於仁宗康定元年（1040）。[65]或如哲宗元祐時蘇軾（1037-1101）守潁州，與簽判趙令畤、教授陳師道唱和的《汝陰唱和集》，今皆不存。[66]文集

61 見〔宋〕楊億，《武夷新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086 冊，卷 7，頁 13 下至 14 下。

62 〔宋〕鄧肅，《栟櫚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133 冊，卷 15，〈丹霞賞音文集序〉，頁 2 上。

63 見〔宋〕朱弁，《風月堂詩話》，收入《四庫全書》第 1479 冊，卷上，頁 5 下。

64 熊海英討論集會詩歌時，指出在北宋中期有一「從廟堂到地方」的變化，不僅由於地方士人的增加，也是朝士轉移到地方的結果，致仕者在地方以「九老會」之類的形式宴集唱和，另一個關鍵則是元祐以後黨爭貶逐的士人，文壇中心由朝廷轉移到地方。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0-62。不過，除了《西崑酬唱集》在真宗朝，可說較早，《禮部唱和詩集》在仁宗朝後期，並不早於歐陽修的《聚星堂詩》及仁宗前期的《潼川唱和集》（見下文），《同文館唱和詩》則晚至哲宗朝。若從知交唱和來看，最早的《二李唱和集》雖在京師開封，其實是私下唱和，在「地方」的《潼川唱和集》與之一脈相承。

65 祝尚書考證，當在張逸知梓州時，見《宋人總集敘錄》，頁 529。

66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4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卷 15，〈總集類〉，頁 423。晁說之序今未見，李廌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保留的唱和序不少，未必另成總集，不能一概而論。[67]《宋史・藝文志》著錄 10 餘種一卷左右的唱和詩，但多不可考。

宋代詩社大盛，可說是此種文友唱和擴大、組織化的表現。[68]有些唱和總集是詩社作品編輯而成，如蘇京編的《潁川集》、[69]王十朋（1112-1171）的《楚東酬唱集》。[70]《楚東酬唱集》是數友反覆唱和（如同唐代，未必在一地），今僅存社友之一洪邁（1123-1202）殘序，闡揚唱和次韻之旨；[71]王十朋有多首詩提及此集，緬懷唱和之樂，也透露因分別在即而刊刻，是紀念交誼之舉。[72]此集《宋史・藝文志》著錄。另《許昌唱和集》是葉夢得（1077-1148）在北宋末年帥潁昌府時，與通判韓瑨（1069-1121）及地方士大夫結社唱和所作詩，當年「許人類以成編」，淳熙二年（1175）韓瑨之孫韓元吉刊刻，作〈書許昌唱和集後〉述其始

〈汝陰倡和集後序〉未提出版，僅為趙德麟出示所集之詩作序，至此仍是由編者趙德麟個人出示的流通方式。參〔宋〕李廌，《濟南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3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清鈔本影印），卷 6，〈汝陰倡和集後序〉，頁 27 下至 29 上。

67 如南宋陸游與韓元吉的京口唱和，未著錄，〈京口唱和序〉似為兩人詩卷之序。〔宋〕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47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宋嘉定十三年〔1220〕刻本影印），卷 14，〈京口唱和序〉，頁 2 下至 3 上。

68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指出其特性為有組織，較固定，人數也較個別酬唱多。

69 無著錄。鄒浩〈潁川詩集敘〉：「〔蘇京〕用劉白故事，裒所謂倡酬者與眾自為之者，與非同盟而嘗與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潁川集。」見〔宋〕鄒浩，《道鄉集》（臺北：漢華文化，1970 據國立臺灣大學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影印），卷 27，〈潁川詩集敘〉，頁 17 上至 17 下。此為蘇京任忠武君節度判官時，在潁川府與一眾友人結社唱和，離任時集其「社」成員個人及彼此唱和的作品，以及社外之人與成員唱和之作而成。參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 185-188。

70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頁 231-235。

71 〔宋〕王正德，《餘師錄》，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61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墨海金壺本排印），卷 4，〈洪邁〉，頁 71。

72 〔宋〕王十朋撰，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20，〈讀楚東倡酬集寄洪景盧王嘉叟〉，頁 352。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末。[73]以其當時職位，可能是用建州官刻。該年周必大（1126-1204）由《許昌唱和集》刻印而與韓元吉討論葉夢得《石林全集》之出版，[74]透露官刻是有職權的官僚常採之途徑，但私人刊刻亦非難以支應，說明當時刊印唱和集的物質條件。雖經刊刻，《許昌唱和集》今不傳，亦不見著錄。詩社可說是長期的群體唱和，相較於北宋早期的官場同僚唱和，詩社延續一段時間，是常態性的聚集，而非一次性的活動。唯就現有資料看來，詩社的紀錄不少，但結集的是少數。

此外，友朋之間數人因各種情境而唱和的自然很多，宴飲之外，遊山玩水時唱和成集者，如嘉祐四年（1059），釋契嵩（1007-1072）與楊蟠、釋惟悟（沖晦）的《山游唱和詩集》，或如南宋朱熹、張栻、林用中的《南嶽唱酬集》。[75]從契嵩和張栻的序可知，這兩次唱和確曾經過「編之為集」（〈山游唱和詩集後敘〉）、「裒而錄之」（〈南嶽唱酬序〉）的收集整理，但宋時皆無著錄，不知是否曾以單行本流傳。《山游唱和詩集》今保存於契嵩《鐔津文集》卷 21，為釋懷悟在南宋初編輯《鐔津文集》時收集所得，[76]但不確定為原來的稿本或另行流通的單本；《南嶽唱酬集》今有四庫全書本，惟據祝尚書考證，乃明人由朱熹等人之文集收錄而成，在南宋時可能只是三人各自保留的鈔本。[77]由此可見，從

73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79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卷 16，〈書許昌唱和集後〉，頁 30 上至 30 下。

74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5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傅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影印），卷 193，〈韓无咎尚書元吉〉，頁 3 上。

75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6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弘治己未刊本重印），卷 12，〈山游唱和詩集敘〉、〈山游唱和詩集後敘〉，頁 12 上至 14 下。〔宋〕張栻，《南軒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167 冊，卷 15，〈南嶽唱酬序〉，頁 1 上至 4 上。

76 卷首註「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焉」，如同《許昌唱和集》序跋所見「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的態度。〔元〕陸友仁，《研北雜志》，收入《四庫全書》第 866 冊，卷上節錄《許昌唱和集》中的序跋，頁 24 上。

77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頁 99-104。

臺灣大學藝術與中國文化庫

整理編輯的稿，到真正流通、著錄的書（「總集」），中間的界線相當模糊。

無論是友朋交好的私下唱酬，或在各種官署正式飲宴的社交酬酢，唱和是宋代士人習見之舉，但唱和集似仍有限。由於現存可見者極少，一般研究常由序與著錄來追索其時編輯唱和集的風氣。將唱和作品稍加整理成「集」，以「序」略述本末，其實不少，由文集中的〈唱和詩序〉可見一斑。問題在於，作序是整理的一環，而不必然意味著出版、流通。著錄是另一項指標，曾著錄者自然可說是成書，較可能曾流通，但以著錄來判斷也僅是相對的標準，曾刊刻者未必著錄，著錄者亦未必流傳。《宋史・藝文志》據宋朝諸國史藝文志編成，國史藝文志所據主要為史館藏書，史館藏書可能由臣僚於編成後直接進獻，而被保存、著錄，卻從未流傳於世。目前可見的資料中，有明確雕版刊刻紀錄的很少。比起雕版，石刻是更常見的傳統辦法，有些在唱和之地立石，成為風景名勝的一部分；[78]有些則是日後另行刻於他處，[79]多為紀念，雖然刻石後可拓印而流傳，一般不在書籍出版的脈絡中。相對於單獨結集，唱和常收在個人文集中，包括所有參與者，如祖無擇（?-1085）《龍學文集》卷五〈唱和詩一十五首〉、卷六〈唱和詩三十九首〉，包含祖無擇多次唱和活動。[80]

綜而言之，在當時的唱和活動中，「總集」的角色並不突出。[81]從當時整體的書籍流通背景來看，關鍵在於，此時的唱和總集尚少以刊刻形式「出版」，相對於現在認知的「書」，當時詩的溝通交流毋寧是以

78 見〔宋〕朱長文，《樂圃餘稿》，收入《四庫全書》第 1119 冊，卷 7，〈虎邱唱和題辭〉，頁 11 上至 12 上。

79 如〔宋〕蘇頌撰，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64，〈錫山唱和詩石刻記〉，頁 989-990。

80 〔宋〕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098 冊，卷 5，〈唱和詩一十五首〉，頁 1 上至 8 下；卷 6，〈唱和詩三十九首〉，頁 1 上至 8 下。

81 例如，繼唐代元、白之後，在文學史上唱和最著、確立次韻的是蘇軾、黃庭堅等人，但他們自己並未編唱和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卷」的形式，即抄錄傳閱。[82]原稿的「詩卷」與另編的「總集」無論內容或流通差別都不大。相較於少數著錄的總集，保留在文集中的〈唱和詩序〉較多，但它們未必都是單行流通的總集，可能僅是詩卷序，即原稿整理加序；[83]若整理後抄錄幾部，收藏或分贈，則可說是詩卷與總集間的模糊地帶；即便是著錄的總集，從少見流傳的結果來看，其流通範圍可能也有限。此一討論不是為了提出詩卷或總集的形式界定，而是說，沒有一個存在意義超過原本詩卷太多的「總集」，也沒有一個特別的市場需要傳統人際流通方式之外的出版，我們要小心由序而推論總集之存在乃至流傳的預設。反過來說，無須「出版」，唱和詩文即可傳播，如秦觀（1049-1100）〈會稽唱和詩序〉所言，在作此序刻石之前，唱和詩已是「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恥」。[84]這些唱和集的重心在記錄活動，在詩文表現，也在紀念交游（但不在表彰個人），

82 每次抄錄的內容繁簡未必一致。唐代文學史學者如 Stephen Owen 等，關注「寫本文化」與印本文化的差異，強調宋以前寫本內容的高度變異，重在指出今日我們所見唐代文學的風貌是經轉為印本時代的宋人之手而傳遞給後世。參 Stephen Owen, “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 no. 2 (December 2007), pp. 295-326. 關於宋代，相對於強調印刷高度發達的傳統看法，最近學者更重視宋代作為從寫本到印本之變化時期的種種表現，如 Ronald Egan 指出寫本在印刷盛行後仍重要的面向。參 Ronald Egan, “To Count Grains of Sand on the Ocean Floor,”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ed.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Leiden: Brill, 2001), pp. 31-62. Hilde De Weerdt 則以王明清《揮麈錄》為例，觀察其寫本出版到印本出版的過程和涉及的人際網絡，探究兩者的不同性質，見其 “Continuities between Scribal and Print Publishing in Twelfth-Century Song China—The Case of Wang Mingqing’s *Serialized Notebook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6 (2016), pp. 54-83.

83 如歐陽修收集他與杜衍生前「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還整理個人所有杜衍之「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卷而藏之」，可見「集」與「鈔」、「刊」是兩回事。見歐陽修，《居士外集》，卷 23，〈跋杜祁公書〉，收入《歐陽修全集》第 3 冊，頁 1058。關於歐陽修與杜衍的唱和，參呂肖奐，〈歐陽修與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論〉，《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四平），頁 43-49。

84 收入〔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 39，〈會稽唱和詩序〉，頁 1265。

臺灣大學出版品資料庫

與整理詩卷差別不大。總集的小規模流通與此呼應，也透露可能並沒有紀念文學情誼之外的特殊動力推動唱和總集的編纂。

從士人群體和社會網絡的角度來看，這些酬唱集也展露、劃分了人際圈。至如南宋《坡門酬唱集》，收錄蘇軾、蘇轍（1039-1112）兄弟與蘇門六君子彼此唱和的作品，為後人輯錄，則與上述單次的唱和結集意義不同，除了唱和的形式外，也反映對文人群體的興趣，可說是結合了文學活動與人際關係，但尚非作者刻意展示自身的人際網絡。[85]

上述唱和的表現與唐代相去不遠。此外，宋代總集中開始看到較多為特定目的而集體賦詠的詩文活動，姑且稱之為「主題詩文總集」。僅就《宋史・藝文志》所著錄，已見多樣活動紛然並呈，如送行的《送王周歸江陵詩》（二卷），[86]歌詠尋母的《送朱壽昌詩》（三卷），[87]歌詠義門的《華林義門書堂詩集》收錄「公卿多賦詩稱美」之作，[88]頌壽的《世綵集》（三卷），元積中《江湖堂詩集》（一卷），[89]題詠建築的《清暉閣詩》。[90]政治色彩濃厚的《大中祥符祀汾陰祥瑞贊》、《大中祥符封禪祥瑞贊》等或亦可納入。[91]與唱和相較，無論是同時或異時，重點不再是作者彼此間的互動，而是作者共同連向某一主題（人、事）

85 呼應宋代《江西宗派詩集》或《四靈集》之類重風格的選集，共通的是分辨、建立文人群體的意識，文學風格的「派」與文人群體的活動交錯。

86 《宋史》，卷 209，〈藝文志八〉，頁 5407：「杜衍等所撰」。

87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中興藝文志〉，見〔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249，頁 6707；〔宋〕文同，《丹淵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85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藏明汲古閣刊本景印），卷 26，〈送朱郎中詩序〉，頁 6 上。

88 《宋史》，卷 209，〈藝文志八〉，頁 5402：「王欽若、錢惟演等作」；《宋史》，卷 456，〈孝義傳〉，頁 13390。

89 皆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249，頁 6707 引〈中興藝文志〉。

90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15，頁 24-2。

91 《宋史》，卷 209，〈藝文志八〉，頁 5395 著錄，參祝尚書，〈散佚宋人總集考〉，頁 517-51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關係。此外，也不同於數個知交往復唱和，主題詩文活動通常包含較大的群體。在宋代，主題詩文總集的多樣，則代表「活動」又受到重視。不過，若以文集中保留的「詩序」作為指標，這類活動在宋代尚是初興，遠不及元代之盛。

其中，最主要還是唐代已有的送行詩。《宋史．藝文志》著錄有太宗朝《賜陳摶詩》八卷、真宗時《送張無夢歸山詩》一卷等，這是皇帝率朝臣送行，[92]可能編成後即送秘閣收藏，故得著錄。亦多朝臣去京之時，在朝官員餞行，可從諸多餞行詩序看出。餞送賦詩，唐代已多，但如上所述，尚少結集；宋代的資料則有較多餞送賦詩之後，關於編輯刊刻的紀錄。如蔡襄（1012-1067）〈陳殿丞送行詩序〉提到「將刻之石而傳於人也」。[93]刊版之例如上引《送王周歸江陵詩》，蘇軾在〈書王太尉送行詩後〉引柳宗元碑陰記先友的典故，[94]而未置於唐代以來皇帝、朝臣餞送的脈絡，將詮釋重點放在贈行詩展露的交游。[95]蘇軾所題可能仍是原來的詩卷，後來王周之孫「欲鏤板以傳」，請楊時（1053-1135）作序，楊時亦強調這種「公卿大夫播之聲詩」的榮耀。[96]不過，這類送行詩見於序文者雖多，實際著錄則少。

綜而言之，在宋代多樣總集紛然並呈的表現中，酬唱並不突出，這並非唱和本身不盛，而是總集編纂不特別著重標榜雙方情誼的唱和集。此時值得注意的發展是主題詩文總集漸出，在元代則蔚為大國。

---

92 《宋史》，卷 209，〈藝文志八〉，頁 5399。參祝尚書，〈散佚宋人總集考〉，頁 515-516。〔宋〕林師蔵等編，《天台續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356 冊，卷上，〈送張無夢歸天台山〉，頁 1 上至 10 上，共 32 首，始宋真宗。

93 〔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 29，〈陳殿丞送行詩序〉，頁 518。

94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68，〈題跋．書王太尉送行詩後〉，頁 2157。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考證該送行詩為《宋史．藝文志》所載之《送王周歸江陵詩》。

95 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 18，〈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臺州詩卷〉，頁 1 下。

96 〔宋〕楊時，《龜山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125 冊，卷 25，〈王卿送行詩序〉，頁 20 上至 20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元

由於明修《元史》無〈藝文志〉，元代的總集除了四庫館臣所錄者，主要依據清代錢大昕（1728-1804）的《補元史藝文志》。[97]不過，其中所錄並非皆錢氏親見仍存之書，而包括其由序文或誌銘等文字收集者。[98]即便如此，其所錄總集數，遠不及宋代，亦不及唐代。

《補元史藝文志》集部分 8 類，別集佔絕大多數，其後是總集、騷賦、制誥、科舉、文史、評注、詞曲。後 6 類皆是兼個人著作（「別集」）與眾人合集（「總集」），所以宋代總集中突出的詞和科舉並不在錢大昕的總集類中。總集類收了 84 種，「選集」約佔一半。

唱和集今存者有馮子振與釋明本的《梅花百詠》，周砥、馬治兩人的《荊南倡和詩集》，許有壬、有孚及有壬子楨兄弟父子唱和為主的《圭塘欸乃集》等，但整體來說遠不及唐宋之盛。少唱和集並非意味著元人酬唱消歇，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元代的「唱酬」以同題共作的詩文活動最為突出，[99]表現在總集上，主題總集取代個別的唱和集，成為最盛行的形式。即使後世列為唱和集者，其活動性質亦強。如果看《四庫全書》和錢大昕列的元代唱和總集，即可見其性質與唐代的廟堂唱和、知交唱和，以及宋代的同僚唱和、詩社唱和的差別。如四庫所列的《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玉山紀遊》三部與顧瑛相關的總集，《草堂雅集》實非「編唱和之作為此集」，姑不論；《玉山名勝集》是收集顧瑛園林玉山草堂多次「宴集唱和」、「園林題詠」的作品，為游宴唱和之大成，[100]每次皆為眾人集體活動，人數不一，參與者不固定；《玉山紀遊》為顧瑛好友袁華所編，同樣是比較開放的集體活動。詩作形式，

97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潛研堂本排印）。

98 陳高華，〈讀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收入氏著，《元朝史事新證》（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4-293。

99 楊鐮，《元詩史》，第四卷第十章，〈同題集詠〉，頁 624-656。

100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8，〈總集類三〉，頁 418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少為個人間的先後唱和，多是眾人間的分韻分題或同題共作。又如規模較小的《至正庚辛唱和詩》，四庫收於存目，今可由《櫆李詩繫》所錄見之，亦是兩次集體分韻唱和活動組成。如果說唐代唱和形式壓過了其下的諸種活動，元代則是主題活動壓過了唱和的形式。

特定主題活動而成之集，錢大昕所錄者，送行有《送張吳縣之官嘉定詩》、《送張府判詩》，歌詠義門的《麟溪集》，侈上賜的《賜杖詩》、[101]頌揚政績的《甘棠集》、《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個人居處的《良常草堂詩》、山水寺觀的《先天觀詩》、[102]《瀛海紀言》等。上文已見宋代「主題總集」的多樣化，但佔整體比例仍低，元代因可考總集數量遠少於宋，主題總集雖亦不多於宋，在總數中的比例則遠高於宋。在這些題詠活動中，重心轉移到被題詠的對象，而不全在唱和的作者。

正是在集體題詠的交游文化中，元代出現了此種彙輯個人一生所得酬唱贈遺詩文而成的酬贈總集。回顧唐宋以來的發展，個人文集中包含自己為酬唱贈答而作者，或個人較長時間內的酬唱集，[103]一時一地酬唱活動成集則包含唱和雙方（或多方），也有個別事件、主題如送行詩而集體頌詠成集，但從未有以收錄個人一生所獲他人贈遺詩文（包括酬唱之作）為主者。這個新形式，及其隱涵的重視他人之作的價值，是從當時以詩卷為表徵的交游文化發展而來。

101〔元〕劉因，《劉文靖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本影印），卷 17，〈賜杖詩序〉，頁 10 下。〔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196 冊，卷 6，〈題王指揮賜龍頭玉拄杖詩卷〉，頁 44 下。

102 必須注意，《先天觀詩》由主題詩卷而來（詳下文），與《雲臺編》六卷「宋朝耿思柔纂華州雲臺觀古今君臣所題詩什」之類收集歷代個別題詠一風景名勝者性質不同。見〔宋〕晁公武撰，張猛校證，《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20，〈總集類〉，頁 1069。

103 如上引唐代《僧靈澈酬倡詩》、宋代宋白的《唱和集》，不過此類資料極少，且其用意仍不同於以收集師友所贈詩文（或附或不附己作）為主的酬贈總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元代的「詩卷」文化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總集類」中列有「送張吳縣之官嘉定詩一卷，送張府判詩一卷，良常草堂詩一卷（皆為張經作）」，實即張經當時得到的三份「詩卷」，今尚大致保留在明代朱存理（1444-1513）的《鐵網珊瑚》中。[104]張經在張士誠攻占平江府時，受張士德（1322-1357）任命為吳縣丞，而開始仕宦生涯。[105]〈良常草堂詩〉是稍早張經隨其父張監（1281-1370，字天民，號鶴溪）館於荊溪王仲德家，以「良常草堂」扁其室，眾友因而為之題詩。[106]前兩種送行詩卷是元代盛行的餞送官員之舉，[107]〈良常草堂詩〉則是元代士人間常見的文學酬酢，以居室等為題賦詠，表達主人心志情思，有圖者也不少。[108]

從《補元史藝文志》僅說明「皆為張經作」看來，錢大昕很可能僅依據上述《鐵網珊瑚》的序跋文字著錄。換言之，這三種「總集」可能都僅以「詩卷」形式存在，即當時士人所予詩文題跋的原稿連綴而成，未必曾編輯成「集」。錢大昕將之納入「總集」類，反映這兩種文本的相似性與相通關係。因此，除了從總集的脈絡掌握酬贈總集之「新」意，元代詩卷本身的發展，則顯示此類總集在文人文化活動中形成的過程。

104 〔明〕朱存理集錄，韓進、朱春峰校證，《鐵網珊瑚校證》（揚州：廣陵書社，2012），頁 328-352。

105 楊基，〈送張府判詩序〉，收入《鐵網珊瑚校證》，頁 336。

106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弘治九年〔1496〕張習刻本影印），卷 7，〈題良常草堂卷〉，頁 10 下。

107 參陳雯怡，〈從去思碑到言行錄〉。

108 例如，張監所館之荊溪王仲德，在元後期戰亂毀其荊溪故居後，其曾孫王允同曾請陳汝秩畫「荊溪圖」。《鐵網珊瑚》在〈陳惟允作荊溪圖〉的標題下抄錄倪瓚作於至正十九年（1359）的序和 10 首題詩，張監、張經及張經弟張緯父子三人之作皆在其中。見《鐵網珊瑚校證》，頁 782-783。主題、場合容或有異，但兩者皆是集體題詠某一共同的主題，是當時文人之間盛行的詩文活動。「荊溪圖」今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317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卷」其實是一通稱，泛指錄詩的物質載體，內容可多可少，少者一至數首詩，多者數十甚或百首；[109]形式可為卷、軸、冊等，[110]為宋代士人間交流詩作的主要形式。從內容看來，多是個人詩卷，收錄一時之詩，有的則是個人作品集，也有二人以上的唱和詩卷；另有少數是送別詩卷或喜雨詩卷之類，以某種主題合眾人詩的集體之作。觀察文集中提到的詩卷，從宋到金元，有兩個隱約的變化：一是「題詩卷」本以詩的形式為主，以文題詩卷之例，南宋以後漸增，不過仍不若詩；二是早期多友人間直接往還，後來請人轉介名士題跋的事例漸多。這兩個趨勢皆在元代成為突出的現象，並伴隨另一整體變化，即眾人共作之主題詩卷的增加。詩卷從主要是小圈子的往來，轉為開放、（意在）擴張的媒介。[111]本節討論的元代「詩卷文化」，即指眾人針對某一主題而作之詩文卷軸盛行的現象。

有元一代，以各種主題邀約詩文的詩卷非常盛行。以下先以魏初（1232-1292）〈申氏父子慶會詩引〉為例，說明這種行為運作的方式：

> 今東曹掾申繼賢以事至長安，持其先塋之碑以示余，蓋今〔金〕儀同三司致仕張公孝純之所撰也。且曰：繼賢上世家澤州，多讀書顯仕者。繼賢晚生，譜牒散亡，不能具述。大人自壬辰兵變，與祖父母暨伯父相失，大人搜訪百至，竟不知所在，日夜號哭。一日有道人崔其姓者，亦澤州人，與大人語，大人因以祖父母及伯父年甲字貫付之，後數年，道人與伯父之子天錫偕至，大人即趨其所在，遂得父子如初。此亦間代奇事，願乞公數語為序引，以求諸名公之詩，將為子孫傳。不識可乎？
>
> 余謂：向分司東川，與順慶教官史子桓者相遇，子桓有元遺山、李

109 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 46，〈題宜春李椿詩卷〉，頁 10 下。

110 如〔宋〕章甫撰，王俊奇點校，段曉華審訂，《自鳴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卷 1，〈履方攜姜坦道詩卷相過為書其後〉，頁 527。〔宋〕周孚，《蠹齋鉛刀編》，收入《四庫全書》第 1154 冊，卷 30，〈書張剛中詩卷後〉，頁 3 上。

111 這樣的轉變是大體的趨勢，而非絕對的差別。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 敬齋中州諸人之詩一巨軸，皆贈遺子桓尋親之什也。子桓亦以壬辰之變與其父睽隔，北渡後子桓周流數萬里，歷六十七城，自始迄今近五十年，卒無所得，……子能求諸賢詠歌以布永久，宜也。遂援翰書繼賢所致之辭以為之引，諸君其有以思之也。[112]

這是至元十八年（1281）魏初為申繼賢寫的序引，說明申繼賢之父親與祖父、伯父在金末戰亂後幸而重聚之事，呼籲眾人賦詩歌詠。申繼賢先持另一名公所撰之先塋碑作為引介，向魏初求序；魏初的序則說明申父事蹟，以其聲名幫助申氏向其他士大夫求詩，顯示這類詩文沿著既有的人際關係產生，獲得的詩文又成為繼續建立人際關係、邀作詩文的憑藉。魏初在序中提到史子桓尋親之例。史子桓有元好問（1190-1257）、李治（1192-1279）等人的詩「一巨軸」，[113]頌詠他尋親之行，顯示此種作法在當時已是常見之舉。魏初在看過前人的贈詩後，自己亦題詩相贈，也展現在求序邀詩後，詩卷不斷累積擴增的過程。

除了這些金元之際戰亂流離產生的尋親詩卷，其他常見的主題詩卷，如：節婦（張之翰〔1243-1296〕《西巖集》卷十三〈貞孝堂詩序〉），孝子（劉敏中〔1243-1318〕《中庵集》卷十〈題費尹傅巖卿孝感詩卷〉），祝壽（蕭斛〔1241-1318〕《勤齋集》卷一〈張氏壽母辛八十之慶歌詩序〉），哀挽（姚燧〔1238-1313〕《牧庵集》卷三〈鄭龍岡先生挽詩序〉）等。另如表彰平反（張養浩〔1270-1329〕《歸田類稿》卷三〈葛推官平反詩序〉），褒揚賑濟（同恕〔1254-1331〕《榘菴集》卷二〈党仲安周急詩

112 〔元〕魏初，《青崖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5，〈申氏父子慶會詩引〉，頁 30 下至 31 下。「今」當作「金」，張孝純為宋金之際士大夫，事跡散見《三朝北盟會編》等書，謝謝匿名審查人提示。

113 今尚可由文集搜得者，如〔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正德二年〔1507〕李瀚刻本影印），卷 30，〈送太原史子桓序〉，頁 4 上至 5 上；〔清〕郭元釪原編，清康熙五十年敕編，《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445 冊，卷 68，〈元好問六・贈史子桓尋親之行〉，頁 11 下至 12 上；魏初，《青崖集》，卷 2，〈贈史子桓〉，頁 3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慶祝得孫（胡祇遹〔1227-1295〕《紫山大全集》卷八〈慶祝氏得孫詩序〉），訪尋祖墓（蘇天爵〔1294-1352〕《滋溪文稿》卷二八〈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五花八門，無不可詠。前代已多的餞別詩卷在元代仍是大宗（劉敏中《中庵集》卷八〈賈灤州驌行詩序〉），或游宴詩卷（王惲〔1227-1304〕《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玉淵潭讌集詩序〉），乃至士人日常的各種齋室亭閣（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恕齋詩卷序〉）等。此處刻意多選元早期北人之作，以顯示這些主題詩卷並非受到南人影響，或後期才發展出來。雖然就現存所見，主題詩卷確是愈後愈盛，但自元初開始，集體頌詠的詩卷已是士人社交文化中習用的形式。[114]

元代眾多主題詩卷多已不存，今日僅能從文集中分散的序、詩得見其夥。不過，明代朱存理《珊瑚木難》和《鐵網珊瑚》之類著作的抄錄，則保留了一些詩卷的整體形態。詩卷在主體的詩外常另有序，有時是已有詩後再倩人作序，以說明諸詩之旨，但當詩卷成為被追求之物，則可能先請名人作序以邀詩，如上述魏初之例。詩卷形成後，詩可以不斷增加，也可能有後序或題跋。如張之翰〈貞孝堂詩序〉：「大參左山商公特書扁，其子台符作記，翰林鹿庵諸老賜之詩，仲舉復求余題端。」[115]顯示，伴隨著張大頌揚，詩卷逐漸成為綜合各種文體的文本，也反映背後活動的繁複及參與者的增加。《珊瑚木難》中即保留一些複雜大型詩卷的內容和形式，如〈無錫華氏貞節堂詩卷〉，包含記、贊、詩、銘、後記、序等。[116]又如〈破窗風雨圖卷〉，雖稱圖卷，並非以圖為主的題跋，而是在圍繞著劉易客居之所「破窗風雨」所作之記、跋、序、詩、

114 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此一行為延續自金代，不過目前金代文章留存太少，這種詩卷文化在金代的表現如何並不清楚。

115〔元〕張之翰撰，鄧瑞全、孟詳靜校點，《張之翰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貞孝堂詩序〉，頁 162。

116《鐵網珊瑚校證》，頁 494-499。Beverly Bossler 討論元代節烈婦女的書寫時，曾分析該詩卷，指出士人如何藉此建立聯繫。見 Beverly Bossler，*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384-392.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篆書等成卷後，加入圖的表達形式。[117]各式文體（乃至書、畫）既能以不同方式充分呈現被頌詠的主題，多位作者亦能以各自的聲望增加被頌詠者的名聲。

詩「卷」由紙張連綴而成，其上所題詩文，或直接題於已連綴的卷上，或題於別紙，再綴上原卷。無論何者，詩卷都可能經過重新編輯連綴。如安成周氏〈聽雨堂詩卷〉，大部分詩文是由於周浩的人際網絡而獲得，但〈聽雨堂詩卷〉則是周浩之子周子冶在明初有感於世亂物改，「稡眾作，牙籤錦軸，裝潢成卷」。[118]此種詩卷經過編輯，但仍為原本墨跡。若經過抄錄或刊刻，則可視為總集，如《董母孝節詩集》，原為皇帝「旌其門曰孝節」時，「大夫士咸歌詩為太夫人壽，而承旨歐陽公（玄）為之序」，後來福州官學將刻孝節詩，又請貢師泰作序。[119]歐陽玄所序（今不存）為詩卷，貢師泰所序為詩「集」。四庫館臣論唐代《高氏三宴詩集》時提到：「蓋當時編次詩歌，裝褫卷軸，如蘭亭詩之墨跡流傳，但歸賞鑒之家，故不著藏書之錄。後好事者傳抄成帙，乃列諸典籍之中耳。」[120]相當扼要地指出「詩卷」（文字、墨跡、關係合一的「原本／實物」）與「總集」（鈔、刻流傳的複本／「典籍」）的關聯與區別，也說明存在脈絡（書墨 vs.內容）的影響。本文一方面指出詩卷與（酬贈）總集間的延續性（共同的文化基底），另一方面，就本文觀察的士人交游而言，這兩者反映不同的行動，「詩卷」的重要性在其「卷」之物質形式所代表的行為模式，即士人題詠的衍生和累積；[121]「總集」則是「集」的行為意義，在最後彙成書冊所欲展現的意旨。

由錢大昕所錄另一總集《先天觀詩》的成集經過，可以觀察由詩卷

117 《鐵網珊瑚校證》，頁 584-593。

118 徐一夔，《始豐稿校注》，卷 11，〈聽雨堂詩序〉，頁 300。

119 〔元〕貢師泰撰，邱居里、趙文友校點，《貢師泰集》，收入《貢氏三家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玩齋集》，卷 6，〈董母孝節詩集序〉，頁 290-291。

120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86，〈總集類一〉，頁 4126。

121 參 Wenyi Chen,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chap. 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到總集的過程。[122]曾貫翁在龍虎山建先天觀後，其弟子危功遠以觀之圖及戴表元之〈先天觀記〉到京師求題詠，圖與記是用來向未曾親見先天觀之朝廷士大夫介紹，後來又有曾貫翁之徒孫毛遂良繼續求詩。在首次求詩幾五十年後，毛遂良欲刊刻積累所得之詩，而請危素作序。故危素的序是為《先天觀詩》此一總「集」而作，此前求詩則是透過記文及圖。《先天觀詩》今不見，戴表元作於大德八年（1304）的〈先天觀記〉則保留在其文集中，另有九人之詩散見諸文集中。[123]序文提到先天觀因這些名士之詩而聲名遠播，可見其作用。《先天觀詩》由「詩卷」積累到刊刻為「總集」，此類「總集」的根本可說是當時的「詩卷」文化。

《先天觀詩》僅是單一主題之詩的累積，以個人為中心的總集，則可能結合不同性質的詩卷，可更清楚顯示詩卷與總集的分別。《補元史藝文志》另錄有高德進《自得齋類編》，未說明內容。高德進名升，《自得齋類編》實為其子高巽志所編，所收除眾人為高升之自得齋所作之詩文，亦包括對高氏墓地白雲山舍的題詠，書中至少包含自得齋與白雲山舍的題跋詩文兩種「詩卷」，即兩份不同主題的題詠活動和文本。據徐一夔〈自得齋類編序〉，《自得齋類編》編成後將刊刻，[124]其中〈高氏白雲山舍詩文〉後來曾以書畫真跡的形式在文人之間流傳。明前期楊士奇（1364-1444）即曾見到靖難亂後，高氏衰微而流出的詩文：「右高氏白雲山舍詩文，自虞道園至蘇伯脩十又一人，雖有崇庳隱顯之殊，然皆當時重望偉人。蓋高氏家寶也，亦可以考見高之賢。」[125]楊士奇的評論讓

122 〔元〕危素，《危太樸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民國三年〔1914〕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影印），卷 10，〈先天觀詩序（辛卯）〉，頁 1 上至 2 下。

123 〔元〕戴表元撰，李軍、辛夢霞校點，《戴表元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 6，〈先天觀記〉，頁 85-86。現存九人詩中，吳師道在〈先天觀〉一詩外，另有〈送毛道士歸先天觀〉，當是毛遂良時求得。見〔元〕吳師道撰，邱居里、邢新欣校點，《吳師道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 8，頁 145、147。

124 徐一夔，《始豐稿校注》，卷 2，〈自得齋類編序〉，頁 42-43。

125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238-1239 冊，卷 19，〈跋．高氏白雲山舍詩文後〉，頁 23 下。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我們得知今已不存的詩卷內容，並點出與這些名士交游展露「高之賢」的意義。《自得齋類編》可說是高升交游所得之文字，高巽志編輯以呈現其父之賢，與一些家集的作法相同。高巽志後來在明初亦編有「粹其師與友贈遺倡酬之文與詩」的《師友集》，無論為先人或為自己而編，底層形式相同，是以交游來呈現個人。

那麼，「詩卷」所反映的交游文化是什麼？唐代柳宗元在其父墓碑之碑陰刻 67 位「先友」之小傳，用以彰顯「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126]宋代邵博（?-1158）闡釋：「柳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127]柳宗元的「先友」，代表從交游來界定個人（相對於墓誌銘將個人置於家族中的傳統概念），成為後世援用的一個典故，雖然文獻所見刻名碑陰的實例不多，[128]但其中蘊含的觀念卻成為模仿或比較的對象，也可能以其他形式表現。[129]上文提到蘇軾在〈書王太尉送行詩後〉已用柳宗元先友之典，而元人在援引時則更加以比較。例如，前引徐一夔在〈自得齋類編序〉中，先敘述高升「樂從宗工鉅儒遊」，包括虞集、歐陽玄、曹鑑、余闕、貢師泰、程文、周伯琦、張翥、危素、張以寧等，接著援引柳宗元，說他：「欲著其父之善，取凡尤厚者六十七人，……徐考其實，不過示交游之廣而已，而彼六十七人者，未嘗有所論著如歐、虞諸君子之于高公也。」[130]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潛在的競賽，不僅比交游之身分地位，也比交游與其

126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2，〈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頁 308。

127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4，頁 108。

128 如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 59，〈碑陰先友記〉，頁 5 上至 8 下。

129 如吳澄〈題袁學正先友翰墨後〉：「昔柳子厚記父友之姓名於父墓之碑陰，使後世知父之所交皆一時名人也。今袁梅瑞用和於主一君交際往來之人，凡書問尚所存者，類為一軸，惟恐失墜，亦以表其父之所交有若人也，蓋猶柳子厚記先友之意云。」見〔元〕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卷 31，〈題袁學正先友翰墨後〉，頁 13 下至 14 上。

130 徐一夔，《始豐稿校注》，卷 2，〈自得齋類編序〉，頁 4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關係之親厚，而徐一夔指出「有所論著」的標準，正是酬贈總集所展現的，也是元人所重視的模式。[131]而蘇伯衡（1329-?1392+）在提到為什麼家集中收錄友朋書信時說：「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攸見。」[132]這是詩卷與酬贈總集隱涵的邏輯，凸顯了「關係」的重要性。因此，不僅是這些詩文本身的文學價值，更是藉由詩文彰顯的交游，以及藉由交游彰顯的個人。

元代眾多詩卷所呈現之追求他人詩文的習尚、無事不可詠的風氣，正是交游詩文日益受到重視的表徵。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看到集合一生所得各種交游唱和文字，彙集各種詩卷、題贈而成的酬贈總集。

三、由詩卷到總集——以《金蘭集》與《澹游集》為例

前言提到現存的四部酬贈總集（《敦交集》、《金蘭集》、《澹游集》、《金玉編》），很集中地出現在元末的至正後期，其中固然涉及保存的偶然性，但作為「樣本」，仍然反映當時的歷史發展。限於篇幅，這些總集呈現的社會網絡以及時代背景，我另以專文討論。本文的焦點則在於此一新「類型」的歷史意義，相對於由殘留之序、詩所見的片

131 同樣地，如元末明初的張紳在為楊性之父所得名士詩文作記時：「嗚呼！余嘗謂人子欲顯其親，至錄其所與交，若柳子者，可謂孝於其親無所不用其心，然所記不過姓名爵里而已，能併存其遺文如此，可謂有加前人者哉。」同樣比較優劣：「東坡謂先友記六十七人，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二十人，今楊氏先友十一人，其文章事業鮮不載國史者。」張紳，〈元賢翰劄疏〉，見〔明〕汪砢玉，《珊瑚網》，收入《四庫全書》第 818 冊，卷 12，頁 9 下至 10 上。

132 〔元〕蘇伯衡，《蘇平仲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寧鄧氏群碧樓藏明正統壬戌刊本景印），卷 4，〈吳氏孝義集序〉，頁 18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段，這幾部難得保存下來的酬贈總集提供完整的形式。本節以四部中分量較大的《金蘭集》和《澹游集》為例，討論的重點有二，一是分析其由詩卷到總集的痕跡，探討這類型總集與詩卷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二是此種形式所透露的交游文化，其中對關係的重視以及形象的塑造。

（一）徐達左《金蘭集》

《金蘭集》為元末明初吳縣士人徐達左於洪武八年（1375）所編，收錄他過去近 20 年所得贈答唱酬詩文之集。由徐達左〈自序〉「恐夫久而泯焉，故錄諸梓以期于不朽云」之言，當時應曾刊刻，但該書真正傳出而為朱彝尊、王士禛（1634-1711）等提及時，已到清初，[133]目前所見最早著錄即為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134]稍後四庫館臣將「金蘭集三卷，附錄一卷」列為存目，[135]今四庫存目叢書本所收為北京圖書館藏清錢氏萃古齋鈔本，正編四卷，補錄一卷，從內容看來，與四庫館臣所見的山東巡撫採進本不同。2013 年有楊鐮、張頤青整理的標點本《金蘭集》出版，以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潛序刊本為底本，以萃古齋鈔本參校。[136]

133 〔清〕朱彝尊撰，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卷 5，「李鐸」條，頁 125、「陶琛」條，頁 129。〔清〕王士禛，《居易錄》，收入《四庫全書》第 869 冊，卷 16，頁 23 下至 24 上。朱彝尊所見《金蘭集》當即此十二世孫出示。〔清〕曹溶，《靜惕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9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1725〕李維鈞刻本影印），卷 25，〈從徐用王借抄其上世良夫學博金蘭集〉，頁 2 下，亦由徐氏後人得見，可能即是「清鈔本」之一曹倦圃鈔本的來源。

134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四庫全書》第 676 冊，卷 31，〈總集類・詩〉，頁 34 下。

13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1，〈總集類存目一〉，頁 4250。這篇提要並未特別批評《金蘭集》，未說明為何僅將之列為存目，但從〈集部總敘〉提到一些唱和總集的批評（卷 148，頁 3089），可以看出四庫館臣主要由「精華集」（「多由論定」）來理解總集，且因厭惡明後期文人標榜風氣，影響其對唱和集一類總集的看法，而這類正是本文討論的由活動而來的總集。

136 版本資料見徐達左輯錄，楊鐮、張頤青整理，《金蘭集》，〈前言〉，頁 4。關於《金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沈德潛序刊本為徐達左從孫徐堅（1712-1798）所輯，以下稱「徐堅輯本」。徐堅在 400 餘年後重新編輯刊刻的《金蘭集》，本為「述祖」、「綿世澤」之舉，在原來徐達左的《金蘭集》之外，「掇拾他書所見，以及家傳卷軸所遺，家老所錄，凡有涉於先世者」，實兼具家集意味。[137] 正編三卷，是友人與徐達左酬答唱和的詩作。續集一卷，共 60 首詩、3 篇記文，主要是徐達左兄子徐濟與友人酬贈之作。最末「耕漁軒遺書」一卷則收集徐達左軼文 5 篇。而萃古齋鈔本正編四卷大致相當於徐堅輯本三卷所收詩，少 80 首左右。補錄一卷則僅收 12 首詩，除了姚廣孝〈大雪中訪良夫〉一詩為贈徐達左，餘為徐濟與友人酬贈之作，數量雖少，卻顯示萃古齋鈔本基本上也已是包含徐濟作品的版本。至於四庫館臣所見之本，今已佚，〈提要〉言正編三卷之外，「附錄一卷，則達左兄子濟出守福建邵武及歸田後與友朋相唱和之詩」，「附錄」相當徐堅輯本的「續集」、萃古齋鈔本的「補錄」。由上可知，這三個本子雖多寡有別，卷數不一，但皆非僅徐達左初編的《金蘭集》，而以「續集」、「補錄」、「附錄」的方式收入徐氏後人之作，徐堅輯本尤多。至於徐達左在明初編的《金蘭集》，主要保留在徐堅輯本的正編三卷（其中亦雜入一些與徐濟相關之詩）以及萃古齋鈔本的正編四卷的部分。

《金蘭集》雖在明後期、清初曾經數次重輯，但到徐堅欲重刊時，已「歲久失傳」，遍尋不得原本，而「流傳鈔本，彼此互異」。[138]以上簡介幾個版本的內容，是為說明，從收羅文獻的角度，最後刊成的徐堅輯本固然廣收博考，內容最豐，被視為「精善之本」，[139]但與原本的差異也較大，若要瞭解《金蘭集》原本之形態，反而必須注意徐堅輯本可

蘭集》現存諸版本，參王媛，〈《金蘭集》提要〉，收入魏崇武主編，《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44-347。

137 徐堅，〈重刻金蘭集跋〉，《金蘭集》，頁 167。徐達左本人即曾「手編其祖父洎昆季叔姪所著詩文若干卷，名曰：《傳芳集》」（《金蘭集》，頁 23），包括其姪徐濟之作在內。但家族的《傳芳集》與他自己友朋酬贈的《金蘭集》是分開的。

138 徐堅，〈重刻金蘭集跋〉，《金蘭集》，頁 167。

139 王媛，〈《金蘭集》提要〉，頁 34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能造成的誤導，此點可從與《耕漁軒詩卷》的比對看出。

朱存理《鐵網珊瑚》中有以「耕漁軒詩卷」為標題的一系列關於耕漁軒的文字，始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高巽志〈耕漁軒記〉，接著是楊基〈耕漁軒說〉、唐肅〈耕漁軒銘〉、包大同〈又銘〉、王行（1331-1395）〈耕漁軒詩序〉（1362），其後自倪瓚〈予既為良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為之詩〉以下，為眾人題詩，共 17 首，最後則為至正二十五年（1365）釋道衍的〈耕漁軒詩後序〉，是上述元後期常見的大型豐富詩卷之一。《鐵網珊瑚》是朱存理抄錄其所見之前人書畫題跋所成，此一順序當為朱存理所見之《耕漁軒詩卷》的順序。徐堅輯本《金蘭集》的卷首則包括：

沈德潛〈重刻金蘭集序〉（1760）
王　行〈耕漁軒詩序〉（1362）
徐達左〈金蘭集自序〉（1375）
釋道衍〈耕漁軒詩後序〉（1365）
袁祖庚（1519-1590）〈題耕漁軒唱酬名蹟序〉（明）
董文驥（1623-1685）〈金蘭集序〉（1672）
東海一老柯（徐柯，1627-1700）〈金蘭集序〉（清初）
高巽志〈耕漁軒記〉（1361）
楊　基〈耕漁軒說〉
沙大用〈耕漁子傳〉
徐　珵〈耕漁子傳〉（1444）
朱逢吉〈樵蘇子傳〉（1403）
王　賓〈題樵蘇子傳〉

粗體字部分是與《耕漁軒詩卷》相同者，可清楚看到個別詩卷被納入總集的痕跡。不過，徐堅輯本《金蘭集》將〈耕漁軒詩序〉與〈金蘭集序〉以及其他傳、記、說等非詩類的文體放在卷首，實際上混淆《耕漁軒詩卷》與《金蘭集》的區別。《耕漁軒詩卷》是以耕漁軒為中心歌詠之詩文，《金蘭集》則是徐達左結集近 20 年來所有唱酬所得詩文，包括但不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限於《耕漁軒詩卷》。從元代的詩卷文化及其請序的模式來看，很清楚地，王行和釋道衍之作乃《耕漁軒詩卷》之序及後序，而非《金蘭集》之序及後序。《耕漁軒詩卷》雖然被收入《金蘭集》，但並非《金蘭集》的前身，而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文本。[140]

在編排上，徐堅輯本《金蘭集》首 7 篇序，除了第一篇沈德潛的序為徐堅輯本而作，以下 6 篇則基本依照時間順序，惟釋道衍的〈耕漁軒詩後序〉或因「後序」之故，被置於徐達左〈金蘭集自序〉後，可能代表將《耕漁軒詩卷》和《金蘭集》視為一體。接著是明後期和清初重輯、刊時之序。在諸序之後，方是《耕漁軒詩卷》中的〈耕漁軒記〉和〈耕漁軒說〉，最後為徐達左與徐濟所作的 4 篇傳。可以說，沈德潛的序為徐堅輯本真正的序，此下諸文則為《金蘭集》歷次編輯之相關紀錄，書末另有徐堅之〈跋〉。[141]

《耕漁軒詩卷》的編排則反映一個不同的結構。《耕漁軒詩卷》以至元二十一年高巽志作之〈耕漁軒記〉為首，內容未及於詩，僅是針對其所居之「耕漁軒」作記。以下另有〈說〉、〈銘〉不同文體闡述「耕漁」的意涵，接著才是王行作於至元二十二年的〈耕漁軒詩序〉，是通過高巽志引介，為已經成卷之耕漁軒詩而作。由此可見，當是高巽志的〈記〉——而非此序——扮演介紹、引導士人賦詩歌詠耕漁軒的角色。[142]在王行作詩序之後，賦詩仍繼續，又過了數年，徐達左復請道衍作後序，詩卷的形式大致完成。[143]如此，「詩卷」的順序實隱涵著一個行動序列，

140 例如，祝軍便因王行〈序〉、釋道衍〈後序〉稱「耕漁軒詩」而認為：「〔《金蘭集》〕初名並非如此。」見祝軍，〈《金蘭集》考論〉，頁 156。

141 萃古齋鈔本卷首為王行〈耕漁軒詩序〉、釋道衍〈耕漁軒詩後序〉以及楊基〈耕漁軒記（「記」當為「說」，無高巽志〈耕漁軒記〉）〉，但沒有徐達左的〈金蘭集序〉。如果這是《金蘭集》原本的形式，則可能徐達左是將文置於卷首。萃古齋鈔本卷首另附有《姑蘇志》等方志關於徐達左及耕漁軒的記載三則，顯然是清初抄錄時所加。《金蘭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9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錢氏萃古齋鈔本影印），卷首，頁 1 上至 6 上。

142 如上引《先天觀詩》亦是以記和圖求詩。

143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 5，「陶琛」條，頁 129。據倪瓚〈題朱澤民為良夫作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亦經綴連、編排，仍可從其內容推測其作用。

很清楚地，「詩卷」和「總集」的編排意義是不同的。總集由已有之作品編輯而成，序加在最前面，闡述編輯的意旨，如徐達左〈金蘭集自序〉：「《金蘭集》者，達左與友朋往來之詩，編集成卷，以見不忘之義也。」[144]或沈德潛〈重刻金蘭集序〉說明重刻過程，其反映之「行為」即是編輯。對詩卷而言，每一種文體，每一首詩文，都經過「獲得」的過程，是人際關係與詩文的交織，序、詩、跋等的先後次序往往具有應和牽引的實際連結。

除了序文之外，徐堅輯本所收詩亦顯示其與《金蘭集》原本的距離。徐堅輯本《金蘭集》所列〈題耕漁軒〉有 41 首，遠過於《耕漁軒詩卷》的 17 首，編排次序亦完全不同，反映徐堅輯本的形式與原來從《耕漁軒詩卷》到徐達左初編《金蘭集》的差別較大。[145]多出之詩可能是後來他人針對同一主題繼續題詩唱和，但未在最初〈耕漁軒圖卷〉的「卷」裡。例如，謝應芳（1296-1392）〈題耕漁軒〉，[146]收錄於《金蘭集》，但不見於《耕漁軒詩卷》，其中提到：「客來遺我金蘭集」，當是《金蘭集》

漁軒圖〉，則朱德潤確曾為徐達左作「耕漁軒圖」。見〔元〕倪瓚撰，江興祐點校，《清閟閣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卷 6，頁 199；亦收錄於今本《金蘭集》，頁 20。不過，倪瓚本人也曾為徐達左作「耕漁軒圖」，今《鐵網珊瑚》所錄〈耕漁軒詩卷〉僅存文字，但第一首詩即為倪瓚〈予既為良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為之詩〉，則此卷若有圖，似為倪瓚所作（四庫本《趙氏鐵網珊瑚》便直接以〈倪雲林耕漁軒圖〉為題，收入《四庫全書》第 815 冊，卷 15，頁 79 下）。可惜在朱存理之後，無人再見此詩卷（或圖卷），不能完全確定《鐵網珊瑚》所錄是否附圖、所附為何人之圖。〔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四庫全書》第 829 冊，卷 49，頁 35 下。

144 徐達左，〈金蘭集自序〉，《金蘭集》，頁 5。

145 《金蘭集》（萃古齋鈔本），卷 1，頁 1 上至 16 下收錄〈題徐良輔耕漁軒〉42 首，《耕漁軒詩卷》中除署名「堅白叟」（徐堅刻本署周伯琦）者外，皆在其中，順序則與《耕漁軒詩卷》大致相同，惟各詩間可能插入未包括在〈耕漁軒圖卷〉中的詩。另唐肅〈耕漁軒銘〉、包大同〈又銘〉亦在其中，而未以「銘」名（可能被誤以為詩）。

146 〔元〕謝應芳，《龜巢藁》，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68-69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鈔本影印），卷 6，〈題徐良夫耕漁軒〉，頁 16。《金蘭集》頁 13 所示篇名為〈題耕漁軒〉。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編成後作，詩中殷殷以勿出仕為勸，亦不同於元末諸詩歌詠隱逸之調，而反映在新朝的處境與心態。當然也可能是朱存理／趙琦美所見〈耕漁軒圖卷〉不全，已難以確知。不過，如徐堅輯本卷二收錄徐達左〈題秀野軒圖〉，來自〈秀野軒圖卷〉，[147]則不合體例，當為徐堅輯入（萃古齋鈔本無）。

《金蘭集》之外，徐達左另有《耕漁文集》六卷，[148]今不傳，僅徐堅輯本末〈耕漁軒遺書〉保留 5 篇徐達左的書序。很明顯地，即使徐達左編《金蘭集》時收錄自己的作品，這些詩是因唱和酬答而收入，徐達左個人其他詩文另有文集，《金蘭集》的主角是其友朋，代表的是《耕漁軒詩卷》以來徐達左建立、擴展的社交網絡。

高巽志〈耕漁軒記〉提供整個《耕漁軒詩卷》詮釋耕漁軒之意義的基調，由此衍生的詩文塑造了徐達左「隱逸」的面貌。這正是「詩卷」這類社交文字的作用，透過記、說、銘、序、傳、詩等不同文體，此唱彼和，徐達左的「隱逸」成為眾人承認且歌頌的形象。擴而大之的《金蘭集》則提供關於徐達左隱逸生活與社交往來更豐富的圖像。其中另有以「遂幽軒」為主題或其他集會而成之組詩約有 8 次，展現此隱居之士的社交生活與人際關係。徐堅輯本《金蘭集》收錄元代沙大用和明代徐珵（徐有貞，1408?-1473）分別作的兩篇〈耕漁子傳〉。沙大用作傳為元後期編《耕漁軒詩卷》時，徐達左年方三十，重在建立其「隱者」的形象，與〈耕漁軒記〉等《耕漁軒詩卷》中的詩文一致；徐珵所作則在徐達左身後，強調其「當勝國之季，更運之初，士大夫能自善以終其身，難矣」的表現。[149]

147 亦收錄於朱存理《鐵網珊瑚校證》，頁 596-604。

148 俞貞木〈故建寧府儒學訓導徐良夫墓志銘〉作一卷，見〔明〕都穆輯，《吳下冢墓遺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7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北京圖書館藏鮑氏知不足齋本影印），卷 3，頁 15 下。

149 徐珵，〈耕漁子傳〉，《金蘭集》，頁 21-22。徐珵時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在傳末以「太史氏」的身分評徐達左「蓋庶乎君子儒者」，因此為之作傳。從其〈先春堂記〉可知，其曾拜訪徐達左曾孫季清之「先春堂」（《金蘭集》，頁 158），透露了為徐達左作傳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徐堅輯本《金蘭集》則讓我們看到《金蘭集》從個人酬贈總集向家集的轉換。後代子孫多次整理《金蘭集》的資訊顯示，雖然徐達左友朋詩文仍然是主體，但《金蘭集》成為徐氏家族共有的資產，徐堅及其父是「從孫」，關係已遠，仍「以隕越為懼」，致力蒐訪重刻。《金蘭集》及其代表的耕漁軒是徐家聲望主要的來源：以徐達左耕漁軒與顧瑛玉山草堂、倪瓚清閟閣並列，是清初《金蘭集》傳出後的說法，提供一個這類著作在不同脈絡中被應用而改變意義的例子。

（二）釋來復《澹游集》

釋來復，字見心，是元末明初知名詩僧；豫章豐城（江西龍興路富州）人，師杭州徑山萬壽禪寺南楚師悅禪師，任內記，後為靈隱書記。至正十七年（1357），他接任慶元路慈溪縣定水禪寺住持，其所居之天香室成為當時文士詩僧游訪的名勝。至正二十四、二十五年（1364、1365）左右，來復編《澹游集》，收錄「一時在朝名公卿大夫洎山林韋布知名士與公（來復）往來贈遺詩章及碑刻記序文字」。[150]

或因歷經改朝換代的變動，以及明太祖朝後期來復「坐法死」的結局，[151]《澹游集》流傳不廣，蘇伯衡在明初尚見之，[152]此後則少見著錄。[153]目前可見的《澹游集》有兩本，一是《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北

的人際因緣。

150 楊璲，〈澹游集序〉，收入〔元〕釋來復編，《澹游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首，頁 213。

151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 23，〈題全室集〉，頁 29 下。關於來復死因之傳言的考證，參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第五章。又徐維里考訂來復卒於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非一般所採用的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言之二十四年。

152 蘇伯衡，《蘇平仲集》，卷 11，〈澹遊集題辭〉，頁 13 上至 15 上。其中提到來復當時住持靈隱寺，則可能作於洪武四年至八年間（1371-1375）。參〔日〕井手誠之輔，〈頂相における像主の表象——見心來復像の場合〉，《佛教藝術》第 282 期（2005 年 9 月，東京），頁 13-33。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第四章。

153 〔明〕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有「澹游集一部一冊」，如其他總集例，未列編者名，不知是否即為釋來復的《澹游集》，收入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冊（北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京圖書館藏的清鈔本，二是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日本至德元年（1384）刊本。據卷首劉仁本（1311-1368）〈序〉，《澹游集》分三卷，但清鈔本僅上、下二卷，卷上是詩，卷下是文；至德元年刊本則為三卷，卷上、中是詩，卷下是文。[154]但經對校，從書的形式與內容，我推測兩本實同一來源：三卷本的格式顯示，卷中係由卷上析出，至德元年本所據當為首次編成後便流傳到日本之版本，而清鈔本則包含一些後來補入的詩文。因此，現存並無一內容遠過於二卷清鈔本的三卷本。

前述清代徐堅重編的《金蘭集》將為不同文本所作之序不加區別地放在一起，元代的《澹游集》卻很清楚分開《澹游集》序與《澹游集》中諸詩卷（如〈清江詩卷〉）的序。清鈔本卷首有 5 篇序，除了第一篇揭汯序無紀年，接下來分別是 1364 年劉仁本序，1365 年釋廷俊（1299-1368）序、楊璲序，及釋至仁（1309-1382）序，皆為《澹游集》而作，闡釋「澹游」之旨。《澹游集》卷下則收有〈送見心之湖南詩敘〉、〈送見心還浙詩序〉以及〈雙峰天香室雅集詩序〉諸序，與其他記、碑、銘等文一起。從卷下之文，可清楚看到《澹游集》中原來詩卷的痕跡。

首先是來復早年的〈清江行卷〉和〈湖湘詩卷〉。至正九年（1349），南楚師悅禪師過世後，三十出頭的來復不遠千里由杭州徒步至湖南瀏陽，請歐陽玄為其師作塔銘。途經清江時，來復在清江的同學「即其所經山川亭榭風土名物分題賦詩，餞贈以期之」，[155]有釋子然〈送見心之湖南詩敘〉；求得墓銘，離開湖南時，瀏陽士人亦「贈以歌詩，謂其能盡事師之道矣」，有釋志玸〈送見心還浙詩序〉。[156]歐陽玄為師悅禪師所作之塔銘今不見，[157]亦不知當日是否曾刻石。從釋志玸提到「徑山

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據讀書齋叢書本影印），卷 10，頁 22 上。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28，頁 31 下，在來復名下有「澹游集（缺）卷」，錢大昕未見。

154 井手誠之輔曾介紹至德元年刊本，列出內容目錄，見氏著，〈研究資料：見心來復編『澹游集』編目一覽（附、見心來復略年譜）〉。

155 周自立，〈題見心湖湘詩後〉，《澹游集》卷下，頁 282。

156 釋志玸，〈送見心還浙詩序〉，《澹游集》卷下，頁 281。

157 歐陽玄著作大部分皆毀於兵火，見魏崇武，〈歐陽玄集．前言〉，〔元〕歐陽玄撰，魏崇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師悅）以一布衲四主名剎」，以及虞集與之共觀畫的回憶，[158]顯示師悅禪師在當時亦活躍於文士名僧圈，但其事蹟今已不存；來復亦無塔銘，生平卻藉由《澹游集》保留下來。其中，此行的「二贈行卷」，使人「知見心之苦心卓行」，[159]為來復在士人圈奠立聲名，來復也充分運用，擴大交游範圍。首先，來復見到歐陽玄時，即出示他在清江獲得的贈詩，歐陽玄有〈觀見心上人清江行卷有感〉一詩；回程時，除了在清江一帶得周自立〈題見心湖湘詩後〉，並未直接回杭州，又「攜江西友朋詩文一卷入吳中」，鄭元祐便因作〈題見心清江行卷後〉，[160]同在平江的蔣堂〈題見心清江行卷後〉可能亦作於同時。3 篇跋文外，卷上另可見以詩之形式題卷後者，如蘇大年〈奉題見心禪師清江行卷四首〉、顧瑛〈奉題見心清江行卷後〉。另劉仁本有〈題復上人為徑山悅禪師求歐陽學士碣銘行卷〉一詩，收於其文集中，[161]今《澹游集》中劉仁本的部分未見。從詩末「至今戒室有天香（原註：上人有天香室）」一句可知，此詩非作於至正九年來復求銘之際，而是多年後來復任定水寺住持時。這說明來復在日後繼續出示這些行卷給新識之人，作為介紹自己的一種方式；也顯示這類詩卷、行卷可不斷增加，不能僅以詩題判斷其作品年代。

在〈清江行卷〉之前，來復已開始以「豫章山房」為主題收集贈詩。不過，今本並無任何關於豫章山房的詩序或記、銘等。來復任定水寺住持後，又開始兩個眾人題詠的主題。一是住持所居的天香室，來復

武、劉建立點校，《歐陽玄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頁 1-15。《澹游集》中與來復往來文字亦皆不見於明代以後收集的《圭齋文集》中。

158 虞集，〈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同予時為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乃題其後云〉，收入虞集撰，王頲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57。

159 周自立，〈題見心湖湘詩卷後〉，《澹游集》卷下，頁 282。

160 鄭元祐，〈題見心清江行卷後〉，《澹游集》卷下，頁 281。

161 〔元〕劉仁本，《羽庭集》，收入《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6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據舊抄本影印），卷 3，頁 148。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取該寺宋代有楊萬里詩「天香來月窟」之句，有 50 餘首題詠，卷下並有楊彝〈天香室記〉、高明〈天香室銘〉、胡世佐〈天香室記〉諸文，當有一〈天香室詩卷〉。除了來訪之人留詩，亦有不少是來復主動求詩而得。此類詩卷雖以一地點為主題，但並不受空間限制，反映拜訪定水寺的交游活動，同時是來復積極延伸其連結的態度。另一個主題是「蒲庵」，卷上共留下 21 首以蒲庵為題的詩，少數明白標出是寄詩，並非親至其地所題。

除了這些長期的主題詩卷，至少有一雅集而成的詩卷，楊彝〈雙峰天香室雅集詩序〉提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時事多虞」之際，在水西寺「相率分韻賦詩，以紀一時之勝」的聚會，卷上可以找到劉仁本、陳履常、王若毅、謝理、項伯溫、釋自悅等人的詩。但由於《澹游集》以人為序編排，這些詩未如《金蘭集》以成卷的形式聚集，而是分列各人之下。楊彝作序是因「今見心合所賦詩如干篇，將刻石以傳，而屬余序之」。[162]因此，在被《澹游集》收錄、分開編排前，這些雅集詩已曾以組詩的形式被刻石流傳。此例顯示這些詩文酬酢在不同脈絡中意涵的轉變：該詩卷形成的當下，是文人詩僧在戰亂中記一時相聚之樂；至刻石之時，則是藉名人雅集詩文「以輝飾山林」，加入水西寺的歷史（如同宋代楊萬里「天香」詩之典）；最後在來復的《澹游集》，雅集之詩被拆開，分列各作者之下，不再強調雅集群體的意義，而重在來復與個別人士的交游關係。

來復一生有多個詩卷，藉此總集留存，讓他成為探索詩卷文化的最好例子。首先，《澹游集》顯示，來復這位詩僧以詩文為憑藉，非常善於經營人際關係。[163]從詩卷到總集，皆是其運用的文化形式。《澹游集》首虞集、揭傒斯、歐陽玄、黃溍，四人皆是元代中後期聲望最高的南方

162 楊彝，〈雙峰天香室雅集詩序〉，《澹游集》卷下，頁 282。

163 《澹游集》中收錄張翥一信，曾勸戒：「《澹稿》多佳語，……區區以為方外高潔，尋常仕宦皆可鄙棄，集中覺送人之官之作頗多，下意似欲撥去此等數篇，……是以未敢僭序。」見頁 27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士。來復在求銘歐陽玄之前即已認識虞集、揭傒斯、黃溍，釋子然〈送見心之湖南詩敘〉已標榜他此前受知於此三人，很可能是來復出示其所得虞、揭、黃等人贈詩的結果。子然又預想：「今又見歐陽公熏炙教論，子之名稱益復張大。」[164]對與名士建立關係有助於個人聲名之效，了然於心。

通過來復之例，可以清楚看到當時「詩」作為社交往來之媒介的表現。詩以言志，以詩交流、酬酢是《詩經》以來的傳統，[165]但此時「詩卷」——特別是主題詩卷——成為收集、呈現這種關係的良好載體。對一個詩卷的參與，可能是因原有的社會關係，也可能是原本不識者在當時已形成的社交文化中，因詩卷的活動性質或行為模式，透過創作而建立新的連結；同時，無論新或舊的關係，都具體展示在詩卷上，呈現給讀者（或後來的作者）。詩卷雖有社交之性質，但不同於以資訊為主的雲萍錄之類，[166]詩最根本仍是一種文學創作，因此「詩卷」並不單單是交游的展示而已。詩卷表現的人際關係來自文學活動，同時具有文學的內涵。可以說，詩卷本身就是物以類聚的結果（詩人，作詩的技藝），而詩卷所反映的價值也與文學相關。例如鄭元祐的評論：

> 見心攜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見心雖

164 釋子然，〈送見心之湖南詩敘〉，《澹游集》卷下，頁 281。

165 Colin S. C. Hawes, *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Emotional Energy and Literati Self-Cultiv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強調詩的社交性。

166 宋代曾盛行一時的「雲萍錄」，從形式的啟發而言，山口智哉將之放在「同年小錄」的傳統中；而如果著重在「記錄交游」的作用，雲萍錄「登載姓名爵里」，與酬贈總集註明作者身分，在「功能」上有共通之處。見〔日〕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錄」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17 號（2002 年 6 月，東京），頁 100-124；〔宋〕姚勉，〈呂雲叔雲萍錄序〉，收入姚勉撰，曹詣珍、陳偉文校點，《姚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43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桑門，其於內外學高出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167]

這段話指出詩卷在餞別時類似「土產」般的角色，詩成為一種禮物，自然是其社交性的展現；而他藉批評流俗以稱揚來復，也透露所得之詩的好壞如何影響受贈者的形象，來復因具學識（內外學）才得到對等的交游，也才能索得佳作。此即諸序常強調的，交游與個人品質的關係。鄭元祐雖意在頌揚，所根據卻是文學的標準。上引周自立所言「知見心之苦心卓行」，是詩的內容反映受贈者的行為，此處鄭元祐所言則是詩的品質和作者所代表的意義。

南臺監察御史蘇天民在至正二十五年巡查四明時結識來復，其贈詩題目極長，其中的敘述充分展現《澹游集》的作用：

〔見心〕因出其所編澹游集以示予，皆當代虞、歐、揭、張諸先輩及時賢朝貴、逸人高士贈答酬唱之作，悉以道義相親而致景慕之意，及觀所載請銘受業之先師，收殯無歸之亡友，編蒲菴以思母，通唱和以納交，與夫起廢寺於喪亂之餘，措身心於安閒之地，其設施行事、則又見其有大過人者矣。[168]

《澹游集》編於至正二十四年，次年來復即已出示於人，顯示除了個人紀念交游之外，使他人得觀更是重要目的。[169]此次為來復到城中拜訪蘇天民，這也透露總集的特性，在定水寺較易出示詩卷原稿，編輯成集後，內容豐於個別詩卷，亦可攜以示人，甚至贈人，[170]適合更進一步流通。而蘇天民的記述正是此類酬贈總集之「實用」價值的展現。他提到其中所見名士對來復的稱揚，以及來復具體的事蹟，分別來自不同主題的詩卷。顯示以酬贈總集介紹個人有兩個要點，一是作者的身分（交游的價

167 鄭元祐，〈題見心清江行卷後〉，《澹游集》卷下，頁 281。此文亦收入鄭元祐，《僑吳集》，卷 7，〈題復見心清江行卷〉，頁 11 上至 11 下。

168 蘇天民完整詩題見《澹游集》卷下，頁 251-252。

169 又貢實烈門詩題亦有「得觀禪師所編澹游集」，見釋來復編，《澹游集》，頁 259。

170 本文未討論的釋克新之《金玉編》（收入《禪門逸書．續編》第 1 冊〔臺北：漢聲出版公司，1987〕），便有蘇大年「雪廬師過吳門，以《雪廬稿》、《金玉編》見貽」的紀錄，《雪廬稿》是釋克新個人文集，《金玉編》是友朋酬贈總集。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值），二是主角的事蹟，共同塑造了來復的地位。透過詩卷與總集，經由士大夫的稱揚，這些詩文呈現來復欲展示的形象。

來復另有《蒲庵集》，是其個人作品的別集，集中之詩亦多為社交往來所作，但與《澹游集》分別編輯，明白呈現出己作與交游作品、「贈人」與「贈我」的區別。《澹游集》卷首諸序皆重在闡釋來復交游的性質，一方面指出其交游之廣，一方面強調其「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的「澹」游。[171]然而，蘇天民等人的記述則顯示元代的「交游」文化，讓我們看到《澹游集》存在的基底，說明交游對個人的現實意義。

結　語

回到本文開頭朱彝尊「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一言。此一評論，由元代的各種唱和總集得出，但就酬和顯示的士人交游文化來說，關鍵不在「極盛」與否的程度之異，而在其性質與唐、宋時期元白、蘇門的唱和之樂有別，表現為「贈」的色彩特別濃，反映當時交游所習用之文化形式與前代的差異。本文討論其中一種特殊的新形式，集個人一生交遊所得序跋詩文等作品而成，正是這種重視「酬贈」詩文的極致。為突出為他人所「贈」的成分，不混同於彼此唱和之作的結集，本文以「酬贈總集」稱之。這類總集不算普遍，流傳下來的更少，然其出現實為元人社交活動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士人在交遊中形成身分和社會形象的極致表現，亦可說是當時士人交遊文化的表徵。

本文觀察由魏晉南北朝到元代這一長段時間「總集」的流變，有兩個目的，一是提供了解酬贈總集新出現的脈絡，二是從「行為」來理解總集的嘗試。

171 揭汯，〈澹游集序〉，《澹游集》卷首，頁 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呼應酬贈總集的兩個要素——詩文活動（贈答、唱和）與人際關係（交游之作），本文從「活動」與「關係」的角度梳理各代總集的發展，可以觀察到，一方面，從唐代以來開始盛行的唱和集，宋元以降雖然不曾或衰，但在多樣化的總集類型中不再如唐代突出，並呈現從私人酬唱轉向集體頌詠的趨勢，表現在主題總集的漸興。如同朱彝尊之例所示，酬贈總集很容易被放入唱和集的傳統而忽略其形式的新意。酬贈總集所收之詩，無論贈答、次韻、同題分韻、分題等等，都已有長遠的傳統，但關鍵在於「總集」的編纂原則，而非「唱和」的文學形式。酬贈總集以收錄友朋酬贈之作為主，既非己身作品，亦非單純往來唱和。從過往「集」的各種類型來說，收錄個別作者作品的別集，雖可能包含他人之作，但皆為附錄；以數個作者為對象的總集，除了以文學標準收錄的選集或全集外，合成一集的原則，可能純以作者的關係連結，如兄弟合集，也可能是作者彼此間的互動之作，如唱和集；再有一種因某些場合或特定主題而生之總集，如同在一會的宴游賦詩成集，或同歌詠某人、事、物的合集。相對於這些類型，「酬贈總集」是以個人為中心，收羅該人所得他人贈答或唱和作品。其中如《金蘭集》、《金玉編》，雖亦收入受贈者本身的作品，但並不佔特別位置，《澹游集》以附錄形式收入，更明顯是從屬，與個人別集中附錄他人作品正好相反。別集展示個人作品，表達自己，[172]酬贈總集則展示他人作品，透過他人作品來展示個人。與同為總集的唱和集亦異：唱和集重視的是一唱一和，作品或有多寡之別，但雙方（或多方）的位置基本對等。酬贈總集則有一個中心，只是其「主角」地位並不來自作者的身分，而來自於其為諸作投贈之對象。至於主題總集，雖同為他人贈作，然以單一事物或活動為對象；酬贈總集的中心則是個人，為個人長期、一生所得作品的集結。

172 如《隋書．經籍志》所言，個別作者「志尚不同，風流殊別」，「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見《隋書》，卷 32，〈經籍志〉，頁 10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正是「活動」與「關係」的取徑清楚顯示，一般精選或全集的概念並不足以含括各種總集。單從目錄學的分類，會看到產生過程、性質截然不同的書皆置於「總集」的類別下，似乎它們之間有本質上的聯繫，實際上共通的僅是眾作之集的「形式」。[173]如果從「行為」的角度思考這種編輯行為對當時士人的意義，則總集的形態不僅表現出當時有什麼作品，並且涉及當時士人想把哪些文字彙集在一起，基於什麼考量，有什麼用途，誰是讀者，流通的範圍有多大等問題，從而反映出某一「形式」的文化特質與社會脈絡。本文探討酬贈總集這種新類型，正是透過追索鑲嵌於社會文化中之「形式」的取徑。以唱和而言，唐代三兩知交多次唱和結集始盛，或紀念彼此情誼、收集保存（非炫示交游關係），亦重視其文學價值。宋元時期，此類唱和仍多，但較少結集。而如《西崑酬唱集》、《禮部唱和詩集》之類，不僅是唱和的行為，且彰顯其同在秘閣修書或禮部考校的場合，唱和者有共通的身分，在引領文風之外，亦紀念該場合，並突出文學之臣的身分（此一館閣文化未在元代總集延續）。因此，總集之編，除了直接的活動內容，也透露總集諸作者的關係，當時士人（不僅編者，也包括讀者）對此一關係的看法，以及總集的文化作用。

從行為的角度思考總集，也促使我們考慮其「出版」的物質脈絡。總集卷帙多寡差別很大，流通程度也不同。唱和集相關資料不多，但上文仍試圖從一些蛛絲馬跡討論出版和流通，是為了瞭解這些「總集」以什麼形式存在，才能由此推測其產生的脈絡。宋代之前，唱和集若曾流傳，是以抄錄或石刻；宋代雕版印刷大盛，書籍數量遠過於前，但刊刻的對象主要是經史，集則以名士文集和科舉用書等商業出版為主。[174]

173 如鄭樵，《通志》，卷 70，〈藝文略〉有「賦」類，兼個人之集與總集，即是「賦」的文體形式壓過了「眾人之作」的總集形式標準。

174 Lucille Chia 關於建陽商業出版的研究，就現存可見的麻沙本，指出：“As for the general collections, there is an even greater emphasis on works useful for the examinations.” 見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 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使在唱和集的範圍內，也隨性質而異。如《君臣賡載集》之類應制唱和恐怕是編成後直接藏史館，縱經著錄，亦未流傳。有些如《西崑酬唱集》與《二李唱和集》在當時確有刻本，得刊之集或有私人資源，或有官府關係，必須從宋代的刊刻條件理解。但此外很多集子在原稿與另行編輯的書籍間差距有限，一則除了稍作選擇刪裁，內容基本相同；再則，無論是以資紀念，或是士人間文學性的交流，都沒有大張旗鼓的必要（或條件），小眾流傳以抄錄等傳統形式便足以應付。相對地，主題詩卷方面，雖然內容相去不遠，但如送行詩卷的石刻提示我們，這類「出版」，除了一般性的紀念外，為個人名聲而張揚交游，是另行編輯的一項動力。

正因為此類總集與行為密不可分，酬贈總集的出現，不能從唱和集的形式演變，而必須放在元代的詩卷文化來理解。詩卷是元人詩文社交的表徵，這些活動既有一時一地如宴會雅集，亦有異地長期如主題詩卷，更皆可不斷題跋延續。對照酬贈總集與自元初便盛行的詩卷行為與形式，可以看出，第一，有些酬贈總集收入詩卷的內容，或由個別詩卷進一步編輯而成；第二，更重要的是，詩卷和酬贈總集是同一種交游文化下的產物。元代盛行的詩卷，反映的是追求他人（友朋、名士）詩文、無事不可頌詠的風尚。酬贈總集正是在詩卷文化上更進一步的表現：將一時一地一事的詩卷或其他酬贈詩文編纂為一集，展現一生的交游所得，並從個人收藏的實物轉為可流通的文本。我們可以想像，友人的詩文以箋紙、卷軸等原來的題寫狀態保留下來，[175]自身的作品也有草稿或副本，關鍵便在將這些作品集結、整理，以供傳佈（抄錄或刊刻）的編輯之舉，如此產生「酬贈總集」，而此舉背後則是想將友朋贈遺之作集合在一起的框架和態度，凸顯出在交游中存在的個體（顯然不同於個人文集為「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我們在「詩卷」文化中可以見到其原型。正因如此，雖然此類總集不多，但如同冰山一角，其存在的底層是元代以詩卷為表徵的交游文化。

175 釋來復曾向虞集求書從前贈詩，因原作「為好事者所得」，見《澹游集》，卷上，頁 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十餘年來，對元代雅集的研究日多，如同明清士人神往於雅集之樂，雅集彷彿成為元代士人文化盛況的象徵。不過，在強調元代「雅集」文化的興起時，應當持平估量整體的狀況，士人宴聚雖是常事，大型雅集是少數，研究中所舉之例多不過玉山雅集等數種，而「雅集」也僅是宴聚的代稱，缺乏明確的界定。相較於「雅集」，本文試圖從「詩卷」與「總集」來掌握當時士人交游的文化形式。詩卷或主題總集與酬贈總集所代表的，首先是產生這些詩卷的活動，由此觀察參與者構成的社會網絡，也顯示「詩」在士人社交往來中的突出角色。但詩卷與總集不僅是這些活動的直接結果，更重要的是，顯示了當時士人繼續運用這種文本的方式與心態。它們不僅是個別活動紀錄，或個別作者參與的表現，也是受贈者人際關係的展示，以及主角在詩文中形象的塑造。

從編纂原則來看，酬贈總集透露的是對關係的極度重視。若將顧瑛的《草堂雅集》與本文討論的酬贈總集合起來看，二者都是以「交游」（即「我的朋友」）為編纂原則：《草堂雅集》是交游之作的選集，作者基本上是顧瑛所識之人，但所錄未必為該人與顧瑛往來之作（雖亦包含，但比例不高），而是該人作品之選；酬贈總集則是交游餽贈酬答唱和之詩，受贈者本人之作雖可附可不附，但皆為「我（受贈者）的朋友送我的詩」，受贈者的中心地位非常清楚。這兩種若用陳尚君的分類，一是選集，一是合集，但皆凸顯交游關係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關係」是他們組織世界的一個框架。惟交游精選集仍突出作者及其創作，友朋酬贈之集則最終指向了受贈的個人／「我」。這個眾星拱月的結構可說是來自主題詩卷、主題總集的遺產：重心由作者轉到被頌詠的對象，引領我們到酬贈總集的另一個特性：透過他人詩文表達的形象。

在元代的各種詩卷中，相對於對節婦孝子義行乃至政績的頌揚，有一類單純是士人之間交游往來所成，或為宴游唱和，或以齋室等為題頌詠個人風致。這兩類常有重疊之處，因其底層的行為模式與態度近似，不同的只是頌揚的性質。節婦孝子義行（甚至政績），從群體身分來說，是士人對「他者」的集體頌揚，而以齋室或其他生活中的事件為主

臺灣大學圖書館

題，則是士人呈現自我，「同」中求「異」的方式，酬贈總集更是在這個「純」文人層面的範圍內產生。

我曾在分析贈序時提到元代「後科舉社會」對名聲的追求，底層網絡的建立，在當時政治結構下對求官得職的助益，以及在士人群體中身分的表徵與文化秩序的建立。在討論去思碑時進一步提出元代「交游文化」對理解元代士人的重要性。「交游文化」有許多面向，從「關係」、「社會網絡」來看，頌揚詩卷（及由此產生的總集如《麟溪集》）是透過既有社會網絡建立新的連結，重在一時的名聲烘托，而不必然是長久的交情維繫。唱和題詠詩卷則是友朋關係的建立與鞏固，酬贈總集也在這個脈絡中，我們要注意，其中固然有求名的因素，但此「名」與個人在士人圈中的「身分地位」常為一體之兩面，而如《金蘭集》、《澹游集》等，集中作品既是交游生活的紀錄，也是友朋情誼的維持、名聲／形象的建立。由《耕漁軒詩卷》到《金蘭集》，徐達左的「隱逸」身分得到確認，《金蘭集》展現的，與其簡單視為一個隱者的社會網絡，毋寧是一個不仕士人如何通過社會網絡，通過文人交游塑造的隱逸形象。[176]同樣地，《澹游集》呈現了來復作為「詩僧」的一面。來復早年的《清江行卷》是頌揚類型的詩卷，不過《澹游集》中還收錄了他以各種居室為主題建立的不同詩卷，以及個別的詩文酬贈，由此呈現的人際關係不限於一時的交際，也包括長期的交游。蘇天民關於來復的敘述，幾乎不及於其釋子身分，而是文人，這是他在文士圈中交游的形象，他所運用的也都是文士的文化價值。他雖然汲汲於求名，但這名聲是作為當時文人（僧）圈中的一員而成立，《澹游集》中的詩文正是這個過程的紀錄。

這幾個本子流傳都不廣，除了本是小眾流傳，或亦受到朝代更替影響。所謂朝代更替，並非戰亂之類的衝擊，更關鍵的是產生這些本子的

176 關於元代士人社群中的隱逸，參陳雯怡著，〔日〕櫻井智美訳，〈大隠は「士」に隠る—「元史・隠逸伝」に見る元代の隠逸〉，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編，《中国伝统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 10 集》（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 331-374。

臺灣人學與術期刊資料庫

元後期士人文化在新朝的消亡。而元後期士人文化在明初逐漸消亡，不僅是個人自然死亡或遭遇橫禍的凋零所致，更是這個世代之後，在新的政治局勢中，其文化形式無以為繼。明代以後，此類總集偶見，[177]但未曾再盛，或亦反映此種類型之總集與元代特殊交游文化關聯之緊密。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100-2410-H-001-068）部分成果。本文寫作、修訂受惠於陳韻如博士、盧慧紋博士兩位關於詩卷、圖卷之資訊與實物的幫助，許銘全博士仔細閱讀初稿並提出意見，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和建議，助理周永蕙小姐細心核對出處資料，以及《臺大歷史學報》編輯費心刪定，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歐陽宣　校對：石昇烜　洪麗崴）

177 如〔明〕徐有貞，《武功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245 冊，卷 3，〈師友集序〉，頁 53 下至 55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點校本。
〔唐〕姚思廉，《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點校本。
〔唐〕張　說撰，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唐〕劉禹錫，《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點校本。
〔唐〕韓　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唐〕魏　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點校本。
〔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文　同，《丹淵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185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藏明汲古閣刊本景印。
〔宋〕王十朋撰，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宋〕王正德，《餘師錄》，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61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墨海金壺本排印。
〔宋〕朱　弁，《風月堂詩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9 冊。
〔宋〕朱長文，《樂圃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9 冊。
〔宋〕李　昉等編，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據宋刊本及明隆慶元年（序）胡維新刊本影印。
〔宋〕李　廌，《濟南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3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清鈔本影印。
〔宋〕周　孚，《蠹齋鉛刀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4 冊。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5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傅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影印。
〔宋〕林師蔵等編，《天台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6 冊。
〔宋〕邵　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姚　勉撰，曹詣珍、陳偉文校點，《姚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
〔宋〕晁公武撰，張猛校證，《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宋〕秦　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宋〕章　甫撰，王俊奇點校，段曉華審訂，《自鳴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宋〕張　栻，《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47 冊。北京：中華書局，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1985 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宋〕陸　游，《渭南文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47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據宋嘉定十三年（1220）刻本影印。
〔宋〕楊　時，《龜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5 冊。
〔宋〕楊　億，《武夷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
〔宋〕鄒　浩，《道鄉集》。臺北：漢華文化，1970 據國立臺灣大學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影印。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點校本。
〔宋〕歐陽修，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宋〕蔡　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宋〕鄧　肅，《栟櫚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3 冊。
〔宋〕鄭　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79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
〔宋〕蘇　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蘇　頌撰，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6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弘治己未刊本重印。
〔元〕王　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24-22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翻元本景印。
〔元〕危　素，《危太樸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民國三年（1914）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影印。
〔元〕吳　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
〔元〕吳師道撰，邱居里、邢新欣校點，《吳師道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6 冊。
〔元〕倪　瓚撰，江興祐點校，《清閟閣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元〕徐一夔撰，徐永恩校注，《始豐稿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元〕徐達左輯錄，《金蘭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9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錢氏萃古齋鈔本影印。
〔元〕徐達左輯錄，楊鐮、張頤青整理，《金蘭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
〔元〕貢師泰撰，邱居里、趙文友校點，《貢師泰集》，收入《貢氏三家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元〕郝　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影印。
〔元〕馬端臨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北京：中華書局，2011。
〔元〕張之翰撰，鄧瑞全、孟祥靜校點，《張之翰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6 冊。
〔元〕脫　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點校本。
〔元〕黃　溍，《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4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印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影印。
〔元〕虞　集撰，王頲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元〕劉　因，《劉文靖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本影印。
〔元〕劉仁本，《羽庭集》，收入《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6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據舊抄本影印。
〔元〕歐陽玄撰，魏崇武、劉建立點校，《歐陽玄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元〕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弘治九年（1496）張習刻本影印。
〔元〕戴表元撰，李軍、辛夢霞校點，《戴表元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元〕謝應芳，《龜巢藁》，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68-69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6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鈔本影印。
〔元〕魏　初，《青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
〔元〕蘇伯衡，《蘇平仲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寧鄧氏群碧樓藏明正統壬戌刊本景印。
〔元〕釋來復編，《澹游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明〕朱存理集錄，韓進、朱春峰校證，《鐵網珊瑚校證》。揚州：廣陵書社，2012。
〔明〕朱存理集錄，《趙氏鐵網珊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5 冊。
〔明〕佚　名，《詩淵》。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稿本影印。
〔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明〕汪砢玉，《珊瑚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8 冊。
〔明〕徐有貞，《武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5 冊。
〔明〕都　穆輯，《吳下冢墓遺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7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北京圖書館藏鮑氏知不足齋本影印。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8-1239 冊。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收入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據讀書齋叢書本影印。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29 冊。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期刊資料庫

〔清〕王士禛，《居易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9 冊。
〔清〕永　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79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重印。
〔清〕朱彝尊撰，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隋唐五代五史補編》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清〕曹　溶，《靜惕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9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1725）李維鈞刻本影印。
〔清〕郭元釪原編，清康熙五十年敕編，《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5 冊。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
〔清〕趙　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據潛研堂本排印。
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續編》第 1 冊。臺北：漢聲出版公司，1987。

二、近人研究

王　媛，〈《金蘭集》提要〉，收入魏崇武主編，《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3。
王　媛，〈元明之際耕漁軒文藝活動考論〉，《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2 期，包頭，頁 44-48。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成明明，《北宋館閣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江雅玲，《文選贈答詩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吳振華，〈從宴會詩序看唐詩創作趨向的轉變〉，《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14 年第 4 期，廣州，頁 1-12、19。
呂肖奐，〈元祐更化初《同文館唱和詩》考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3 期，成都，頁 91-97。
呂肖奐，〈歐陽修與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論〉，《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四平，頁 43-49。
李　凱，〈宋代的總集編纂〉，《內江師專學報》1991 年第 3 期，內江，頁 57-63。
李珍華、傅璇琮，〈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中國韻文學刊》1988 年第 2、3 期，湘潭，頁 1-18。
岳娟娟，《唐代唱和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胡大雷，〈中古「公宴」詩初探〉，《廣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南寧，頁 65-72。
胡大雷，〈中古祖餞詩初探〉，《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6 期，1998 年 12 月，南寧，頁 95-99。
孫克寬，〈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張雨〉，收入氏著，《寒原道論》，頁 285-31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徐永明，〈高則誠生平行實新證〉，《文學遺產》2006 年第 2 期，北京，頁 93-98。
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以見心來復為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祝　軍，〈《金蘭集》考論〉，《河南社會科學》2011 年第 6 期，鄭州，頁 156-158。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
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張　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陳元鋒，《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論〉，收入氏著，《唐代文學叢考》，頁 184-22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陳高華，〈讀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收入氏著，《元朝史事新證》，頁 274-293。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
陳雯怡，〈從去思碑到言行錄——元代士人的政績頌揚、交游文化與身分形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 本第 1 分，2015 年 3 月，臺北，頁 1-52。
陳雯怡著，〔日〕櫻井智美訳，〈大隠は「士」に隠る—「元史・隠逸伝」に見る元代の隠逸〉，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編，《中国伝统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 10 集》，頁 331-374。東京：汲古書院，2015。
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
傅　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曾棗莊，《論西崑體》。高雄：麗文文化，1993。
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楊　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楊　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後的大都文壇〉，《文學遺產》2004 年第 6 期，北京，頁 96-103。
楊　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二版。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
劉嘉偉，〈詩僧來復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動考論〉，《五臺山研究》2014 年第 3 期，太原，頁 28-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嘉偉，〈釋來復澹游集文獻價值芻議〉，《新世紀圖書館》2014 年第 7 期，南京，頁 73-75。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盧燕新，《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日〕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錄」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　会と文化》第 17 號，2002 年 6 月，東京，頁 100-124。
〔日〕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3。
〔日〕井手誠之輔，〈研究資料：見心來復編『澹游集』編目一覽（附、見心來復略年譜）〉，《美術研究》第 373 期，2000 年 3 月，東京，頁 209-227。
〔日〕井手誠之輔，〈頂相における像主の表象——見心來復像の場合〉，《佛教藝術》第 282 期，2005 年 9 月，東京，頁 13-33。
Bossler, Beverly.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Chen, Wenyi.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Chia, Lucille.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De Weerdt, Hilde. “Continuities between Scribal and Print Publishing in Twelfth-Century Song China—The Case of Wang Mingqing’s *Serialized Notebook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6 (2016), pp. 54-83.
Egan, Ronald. “To Count Grains of Sand on the Ocean Floor.”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edited by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pp. 31-62. Leiden: Brill, 2001.
Hawes, Colin S. C. *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Emotional Energy and Literati Self-Cultiv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Langlois, John D.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no. 2 (December 1980), pp. 355-398.
McDermott, Joseph P.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Meyer-Fong, Tobie. “Packaging the Men of Our Times: Literary Anthologies,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the Early Q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 no. 1 (June 2004), pp. 5-56.
Owen, Stephen. “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 no. 2 (December 2007), pp. 295-326.
Yu, Pauline.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 1 (June 1990), pp. 163-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8 (December 2016), pp.47-104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6.58.02

Recipient-oriented Poem Anthologies and Literati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Chen, Wenyi*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a new type of anthology, a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 or essays one literatus received from his friends over his lifetime, that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 Yuan (1206-1268). As anthology, it includes works from more than one author, but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is not the author but the common recipient of the works. In contrast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one single author, or the selected works of several authors, or the collection of "poem and response"(*changhe* 唱和) poems among a few authors, it represen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idea of compil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is new form of an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anthologie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on, then explains its appearance in the special Yuan culture of the "poem scroll," and finally analyzes two extant anthologies of this new kind: *Jinlan ji* by Xu Dazuo (1333-1395) and *Danyou ji* by Shi Laifu (1319-1391).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is new kind of anthology i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i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Yuan, an ultimate expression of how literati formed their identity and image in "social writing."

Keywords: anthology, poem scroll, *Jinlan ji, Danyou ji*, Yuan literati, social interactio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130,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11529, Taiwan (R.O.C.);
E-mail: wenyi@asihp.net.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